

民族主義 與兩岸關係

哈佛大學東西方學者的對話

江宜樺・吳忻怡・吳叡人・李廣均・汪宏倫・林佳龍・張茂桂
許宗力・王飛凌・吳國光・周建明・陳其・鄭永年
合著

林佳龍・鄭永年 主編

新自然主義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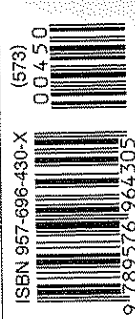
民族主義與兩岸關係 哈佛大學東西方學者的對話

林佳龍・鄭永年 主編 新自然主義

民族主義是兩岸關係的核心問題。過去如此，現在如此，未來也是如此。約在一個世紀之前，同樣面對帝國主義的侵略，中國大陸和臺灣卻走向兩種不同的發展路徑。

在滬峽的左邊，建立一個以收復古老光榮的統一國家，一直是中國人所夢寐以求的。但在海峽右邊的臺灣人，思索的卻是如何逃脫外來強權的宰制，以擁有決定自己命運的權利。這兩種民族主義都有自己的悲情，也都要追尋自己的榮耀。兩者會走向衝突，還是否獲得和解，不只關係著兩個社會的未來，也會影響亞太乃至全球的發展。

這本論文集深入探討了兩岸民族主義的歷史起源、演變過程，以及未來的發展，並試圖提出解釋和解決之道。這是一本關心兩岸前途的人不可錯過的學術專著。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新自然主義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
(原 月旦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定價 450 元

民族主義與兩岸關係 林佳龍、鄭永年主編
臺灣研究基金會叢書二之六，頁 217-266
2001 年 4 月，臺灣，臺北：新自然主義公司出版

臺灣民主化與國族形成

林佳龍

國立中正大學政治學系 助理教授

壹、前言

臺灣人的政治認同在這幾年來發生了顯著的變化。在不到十年之間，臺灣社會中自我認同是臺灣人的比例不但快速增加，而且已經明顯超過了自我認同是中國人的比例。同樣地，在臺灣人民中，支持建立一個獨立主權國家的人口也逐漸超過了追求與中國大陸統一的人口。這些現象說明人們的政治認同並不是與生俱來或固定不變的，而是會隨著環境而發生變化。關鍵的問題是，我們如何解釋臺灣人民的國族認同(national identity)會在這麼短的時間內發生如此重大的轉變呢？這篇文章企圖回答和臺灣認同政治有關的三個問題：(1)這個新形成的臺灣認同的性質和內涵是什麼？(2)什麼因素導致了臺灣人民國族認同的急遽變化？(3)國族認同的變化對臺灣的政治發展有什麼重大的影響？

本文將指出，臺灣近年來的民主化是導致人們政治認同變化的關鍵因素。和其他多族群的分裂社會類似，臺灣的民主化除了涉及到「政體」的正當性危機之外，還包括人們企圖對「國家」疆界進行重新界定。換句話說，許多人致力的不只是要在臺灣建立一個民主的「政體」，還要建立一個民主的「國家」。而就在臺灣認同崛起的過程，外省少數族群或者因為統治地位的喪失，或者因為對獨立運動的恐懼，自覺或不自覺地將「(國民黨)政權

保衛戰」升高成「(中華民國)國家保衛戰」，而其結果是更進一步激化了認同的衝突。除了島內兩種民族主義和建國運動的拉扯(臺灣民族主義 vs. 中華民族主義)，臺灣的民主化還因為一個外部因素，即來自彼岸中共政權的威脅，而面臨更嚴厲的挑戰。簡單地說，臺灣認同政治的特質表現在以下複雜的三角關係中：在臺灣多數族群(本省人)企圖建立一個新而獨立的國家時(nationalizing state)，社會上存在著一個少數族群(外省人)(national minority)反對這個建國計畫，並希望藉助他的母國(national homeland)促成民族的統一，而該母國(中國)也不排除在必要時會訴諸武力來解決這個島上的認同爭議。

因為人們對國家和民族的疆界具有不同的想像，加上對岸的中共政權又對臺灣具有領土的野心，臺灣到民主鞏固之路仍然充滿艱難。在認同政治方面，臺灣的民主發展面臨著以下三個考驗：(1)居於人口多數的本省人和臺灣認同者如何看待外省人和中國認同者？在他們理解中，何謂「臺灣人」和「臺灣獨立」？他們所要建立的是一個以族群為基礎的民族國家(ethnic state)，還是一個以公民權為基礎的政治國家(civic state)？(2)居於人口少數的外省人和中國認同者如何面對與起中的臺灣人認同和台灣主張？他們會將臺灣人和中國人視為兩種對立的認同，還是可以同時擁抱這兩種認同？他們能否接受以民主的程序來決定臺灣前途，還是即使尋求中國的介入也在所不惜？(3)面對中國的威脅，臺灣各族群的人民能否形成一種休戚與共的認同感，聯合起來共同抵禦外來的侵略？最重要的是，臺灣人民能否將民主的價值置於不同的國族想像之上，以和平的方式來解決或調和政治認同的衝突。

民族主義(nationalism)和民主(democracy)之間經常充滿緊張。這是因為即使兩者都主張「人民的意志」是至高無上的，但卻傾向用不同的標準來界定「誰是人民」。較狹隘的民族主義者常用血統、種族、地緣、宗教和文化等族群特徵來界定「人民」，而崇尚自由主義式民主者則傾向用公民權等政治身份來界定「人民」。事實上，民族主義之所以和「民主」時有摩擦，主要是因為用狹隘的族群特徵而非政治身份來界定「民族」，並認為國家必須

要由單一民族來構成。可以想像的是，如果每個民族都要組成一個國家或每個國家都只能由單一民族構成，那麼以目前全球大約只有 10% 的國家的政治疆界和族群疆界是一致的而言，¹人類勢將因此陷入無止境的認同衝突。正因為要組成單一民族國家(one nation, one state)的可能性很小或代價太高，許多學者乃呼籲以「公民民族主義」(civic nationalism)、「自由民族主義」(liberal nationalism)或「土地民族主義」(territorial nationalism)來取代較狹隘的「族群民族主義」(ethnic nationalism)。²用 Juan Linz(1993: 2)的話說，對存有認同衝突的分裂社會來說，如果民主主要能鞏固，那麼人們所應努力建立的不是「民族-國家」(nation-state)(或稱族國)，而是「國家-民族」(state-nation)(或稱國族)，因為後者是以共同生活的政治社群做為國家認同的對象，並且容忍甚至欣賞相異或多重的民族想像。

公民民族主義能否做為臺灣族群和認同衝突的出路？這種主張是「深思熟慮的期待」(thoughtful wishing)？還是「一廂情願的想像」(wishful thinking)？對這個問題，我們此時或許無法提供明確的答案，但本文希望透過整理和分析既有的經驗性材料(包括民意調查資料和菁英的論述)，來幫助思考臺灣民族主義的性質與發展。以下將先介紹臺灣人民的國家認同和統獨立場在民主化的過程中發生了什麼樣的變化？不同背景的人如何界定「臺灣人」和「中國人」？他們能否接受以民主、和平的方式來解決認同爭議？資料顯示，雖然人們對兩岸關係的終極選擇仍缺乏共識，但對多數人來說，「臺灣人」指涉的已經不再是族群的概念，而比較是一種政治和地理的認

¹ 參見 Walker Connor 1996: 29-30。

² 關於最近討論這兩種民族主義的西方文獻，請參考：Anthony Smith 1991; Liah Greenfeld 1992; Rogers Brubaker 1992, 1996; Yael Tamir 1993; Larry Diamond and Marc Plattner, eds. 1994; Charles Kupchan, ed. 1995; David Miller 1995; Gopal Balakrishnan and Benedict Anderson, eds. 1996; Juan Linz and Alfred Stepan 1996; Michael Keating 1996; Robert McKim and Jeff McMahan 1997; Ernst Haas 1997。對臺灣民族主義的討論，可參考：張茂桂等 1993, 1997; 吳乃德 1996; 吳敏人 1997; 江宜樺 1998; Chia-lung Lin 1998: 第 14 章。

同。有趣的是，即使是外省人，也似乎逐漸可以接受臺灣認同，許多人開始認為自己同時也是中國人也是臺灣人。在具有雙重認同者的認知中，大多數人將「中國人」理解成一個文化（華人）或種族（漢人）的概念，但並不要求建立一個統一的華人或漢人國家。事實上，大多數臺灣人民已經逐漸接受臺灣（或中華民國）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或政治實體），她的國土和國民範圍並不涵蓋中國大陸及其人民。更重要的是，包括一部份外省人和中國認同者在內（尤其是較年輕的世代），大多數臺灣人民已經可以接受以漸進和民主的方式（像是服從多數和尊重少數等原則）來處理認同的衝突。一個公民族主義正在臺灣形成中。

因為政治菁英的論述和動員是形塑人們國族認同的重要因素，本文將分析臺灣主要政治勢力（包括不同政黨和李登輝）如何選擇論述的立場？而不同的立場最後為什麼會朝「命運共同體」、「新臺灣人」和「民主自決」等公民族主義的論述方向匯合？作者將指出，近年來的民主化（尤其是選舉競爭）是促使臺灣政治菁英逐漸拋棄族群動員、改用公民國家論述來爭取群眾支持的主要因素。資料顯示，民主在臺灣的實踐不但在群眾層次創造出一種共同的政治認同、價值和成就感，持續的選舉參與也形成了一個多元交錯的利益和議題結構，使菁英之間的競爭不再是零和(zero-sum)的鬥爭，而是一種談判、妥協和分配的政治過程。

另一個同時在影響臺灣公民族主義論述形成的力量是兩岸關係。因為中共對臺灣的威脅並未隨著兩岸的交往而解除，對絕大多數臺灣人民來說，無論省籍背景和國家認同為何，心理上都必須面臨來自對岸政權的壓迫。這種外加的集體苦難不但迫使臺灣人民超越內部的省籍和認同差異以便共同為臺灣的存續而戰，更重要的是，許多人開始體會到兩岸的差異是一個難以跨越的鴻溝，真正分開這兩個社群的不是民族或文化的認同，而是民主 vs. 極權的體制和價值之爭。相當諷刺的是，正因為極權的中共政權壟斷了對「中國」和「中國人」的詮釋，排除臺灣人民積極參與建構中國民族主義的機會，反而迫使臺灣人民不得不跨越內部的族群分歧，轉而建構以民主的「臺灣」

和「臺灣人」為論述基底的新政治認同。

如果我們將民主化和選舉競爭視為一種「拉力」，由內而外把臺灣人民拉在一起，那麼中國的威脅和壓迫則發揮「推力」的作用，由外而內把臺灣人民推在一起。作者在結論處將指出，這兩種力量持續交互作用的結果，可能進一步深化臺灣民族主義的民主內涵，而這個新形成中的公民民族主義對於臺灣民主的發展應該會起正面的作用；但也必須注意的是，只要中國繼續施行專制統治，兩岸的摩擦和衝突恐怕無法避免，而這對台海兩岸的和平與發展無疑地都是一個巨大的挑戰。

貳、臺灣人民國族認同的轉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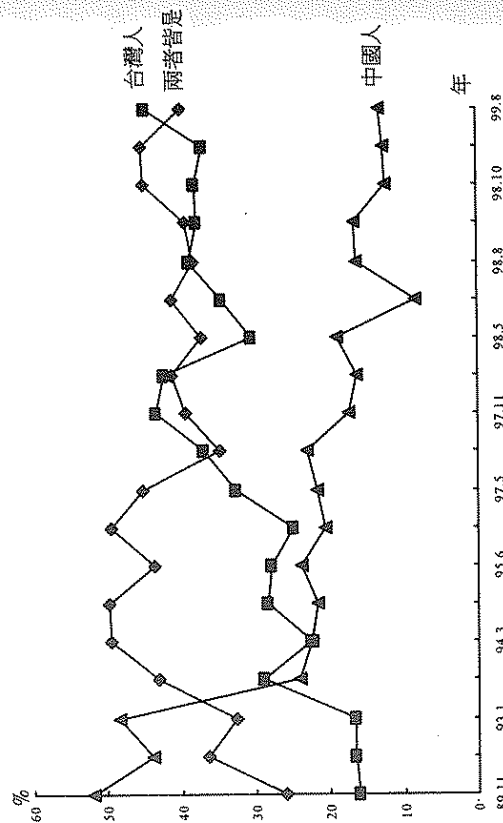
一、臺灣人認同 vs. 中國人認同

在過去十年內，臺灣人民的國家認同、民族認同或國族認同(national identity)無論在質和量兩方面皆發生相當顯著的變化。根據作者所知最早的全國性調查資料，在1989年時，受訪者認為自己是臺灣人的比例只有16%，而認為自己是中國人的比例則高達52%，此外，還有26%的受訪者認為自己既是中國人也是臺灣人（或既是臺灣人也是中國人）。³隨著政治民主化的發展，臺灣人民的國族認同開始發生巨大的變化。根據各機構所做的民意調查，大約自1994年初之後，自認是臺灣人的比例已經超過自認是中國人的比例；⁴此後，二者的差距甚至持續擴大（參見圖一）。⁵相較於一般群眾，

³ 以上數字取自民意調查中心所做之電話訪問。參見《聯合報》1989年11月29日。

⁴ 根據作者先前的研究，自認為是臺灣人和支持臺灣獨立者在1994年開始發生急速變化，應該和海峽兩岸互動和衝突的升高有密切關係。參見：Chia-lung Lin 1996, 1998。

政治菁英的臺灣認同傾向更是明顯。根據作者在 1995 至 1996 年間對 66 位立委所做的深度訪問，有高達 59% 的立委自認是臺灣人，只有 11% 自認是中國人，其餘的 30% 則是具有雙重認同者（即同時是臺灣人和中國人）。⁶



資料來源：除 1989 年資料取自《聯合報》，其餘資料得自行政院大陸委員會委託之調查研究。

圖一：臺灣人民國家認同的變化

除了中國認同者和臺灣認同者的勢力消長之外，圖一另一個值得注意的發現是一直大約有三至四成的受訪者認為自己同時是中國人和臺灣人。對於

這個現象的合理解釋應該是，許多先前的中國認同者開始願意承認自己也是臺灣人，但因為他們對中國仍有強烈的認同感，因此並不願在接受新的認同時即拋棄了原先的認同；對他們來說，接受雙重的認同，至少在短期之間，會是一個較自在的選擇。因為具有雙重認同者的總比例並未發生明顯變化，以上現象的另一層涵義應該是有些先前是雙重認同者在最近選擇拋棄了中國人認同，開始認為自己是臺灣人但不是中國人。

除了國家認同的變化之外，臺灣人民對於兩岸政治關係的終極安排（即統一和獨立的選擇）也發生了重大的變化。根據《聯合報》在 1989 年所做的民意調查，在國家選擇的偏好上 (stateness preference)，有 53% 的受訪者主張臺灣應該和中國大陸統一，而只有 6% 認為臺灣應該成為一個獨立的國家（《聯合報》1997 年 7 月 4 日）。隨著臺灣民主化和兩岸互動日益頻繁，臺灣人民的統獨立場也開始產生變化。再次引用《聯合報》的民調資料，支持臺灣獨立的民眾在 1994 年時已經超過了支持兩岸統一的民眾；在最近兩年以來，支持台灣獨立和統一的人口大約分別是三成和兩成上下（另有三至四成左右主張「維持現狀」）。⁷基本上，經過十年的政治發展，臺灣民眾支持統一的比例已經大為下降；但值得注意的是，贊成台灣獨者雖有增加但也並未超過半數，而造成此一現象的主要原因是一直有約三分之一左右的

⁷ 引自 Chia-lung Lin 1998: 508, 542。各機構針對民眾統獨立場所做調查之結果往往差異甚大，這主要應該和問卷的設計不同有關。《聯合報》的問卷設計主要有兩種，其中一種只詢問受訪者支持「臺灣獨立」或「中國統一」（二選項），另一種則詢問受訪者支持「臺灣獨立」、「中國統一」或「維持現狀」（三選項）。可以理解的是，當直接採用三選項的問題詢問受訪者時，受訪者較可能回答「維持現狀」，但如果採用二選項的問題詢問時，則受訪者較可能回答「臺灣獨立」或「中國統一」。相較於《聯合報》的研究，在陸委會所委託的調查中，支持台灣獨立的比例都明顯偏低，而這應該和陸委會的問卷設計是六選項問題有關，即詢問受訪者是贊成「儘快統一」、「儘快宣佈獨立」、「維持現狀以後統一」、「維持現狀以後獨立」、「維持現狀以後再決定」或「永遠維持現狀」。基於以上原因，雖然陸委會可能是臺灣目前最頻繁進行統獨立場調查的機構，作者並未引用陸委會在此一問題上的調查發現。

⁵ 除了行政院陸委會所委託的調查研究之外，《聯合報》、《中國時報》和民進黨的調查研究也有相似的發現。

⁶ 關於相關的研究設計和發現，請參見 Chia-lung Lin 1998。

民眾主張「維持現狀」。雖然主張「維持現狀」實質上也就是支持臺灣和中國大陸繼續維持分離和分治的狀態，⁸但這些人和台灣支持者主要不同點是他們比較願意宣佈台灣可能招致中共武力犯台。從這個角度來看，主張「維持現狀」者比較是現實主義者(realist)而非民族主義者(nationalist)。

因為統獨選擇可能牽涉到人們對現實利害的理性計算而非內心深處的認同感受，作者傾向用「臺灣人 vs. 中國人」而非「臺灣獨立 vs. 中國統一」來探討國族認同的變化。⁹採取以上研究策略的另一個考量是因為前者是一個比較穩定的變項。相較於統獨立場比較容易受到外在環境和短期事件的影響而變動，國族認同往往要經過較長時期的政治社會化過程才形成，也因此，如果一個人的臺灣人認同或中國人認同發生變化，我們比較有理由相信

⁸ 必須指出的是，雖然一直有相當比例的民眾主張「維持現狀」，但是所謂的「現狀」實際上已經隨著時間和形勢的變化而產生重大變化。在中華民國被迫退出聯合國和美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前，所謂的「現狀」指的是一個處於內戰狀態的中國，而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在競爭中國的代價權。隨著國際情勢的變化，尤其是中共在文化大革命結束後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並且積極參與國際事務，中華民國的國際人格已經逐漸消失。稍後，因為臺灣的民主化和本土化，海峽兩岸的問題已經不再是對中國代表權的爭奪，而比較是兩個對等獨立國家的關係（無論稱之為「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尤其在1991年臺灣執政當局宣佈終止動員戡亂時期以及稍後兩岸政府開始透過海基、海協兩會進行談判之後，兩岸關係基本上已經走出內戰狀態（至少在臺灣方面是如此），進入「關係正常化」的階段。如果我們考慮臺灣在經歷數次修憲和選舉之後已經形成了新的憲政體制與政府（例如總統和國會改由臺灣人民直選產生、中華民國憲法的五權架構產生質變），臺灣應該已經具備主權國家所需的一切要件（或可稱之為「中華民國第二共和」）。尤其在李登輝總統於1999年7月對外宣示兩岸關係是「特殊的國與國關係」之後，一般認為國民黨政府基本上已經拋棄了「一個中國」的論述，朝「兩個中國」的方向發展。如果贊成「維持現狀」代表支持以上新的憲政體制和兩岸關係，那麼實質上和贊成「臺灣獨立」似乎已經沒有太大的差別。

⁹ 誠如吳乃德(1996)的研究指出，一個內心同情台獨的選民可能因為宣佈台灣容易招致中共武力犯台而贊成維持現狀，在另一方面，一個內心同情統一的選民也可能因為擔心戰亂統一可能失去擁有的自由和幸福而贊成維持現狀。

這是國族認同真的發生轉變。此外，鑑於在一般情況下人們的國族認同不太會在短時間內發生劇變，我們對於臺灣人認同快速興起，應該在一般社會因素之外再尋求政治性的解釋（詳見稍後分析）。¹⁰

二、臺灣人認同的性質與內涵

在說明了臺灣人認同在數量上的變化之後，以下進一步分析這個崛起的臺灣人認同之性質與內涵為何。在民主化之前，無論在官方的語言或民間的認知中，臺灣人幾乎就是本省人的同義詞。所謂臺灣人或本省人，主要指的是在國民黨政府接收臺灣前即已生活在臺灣的各個族群，其中包括閩南人、客家人和原住民。所謂的外省人，則指戰後才從中國大陸遷入臺灣的省移民。¹¹雖然本省人和外省人之間的矛盾很快就發展成為臺灣當時最嚴重的社會分歧，但必須瞭解的是，不但本省各族群使用的是不同的語言，就連外省人內部之間，也使用不同的方言系統。在威權統治時期，臺灣人意識可以說是本土反對勢力動員本省群眾、挑戰國民黨外來政權的最重要武器。

¹⁰ 當然，在解釋臺灣人認同快速興起的現象時，我們還必須考慮到政治氣氛變化對受訪者可能產生的影響。因為臺灣在1991年廢除動員戡亂時期懲治叛亂條例和1992年廢除刑法第一百條之前，國家認同在臺灣仍是一個極為敏感的議題。一個合理的猜測是，在1992年之前，應該有相當數量的受訪者不願意在受訪時表示自己的臺灣人認同。也因此，在民意調查中表示自己是臺灣人不是中國人的比例極可能是低估的數字。不過即使如此，鑑於在1992年之後臺灣人認同的比例仍然持續的升高，而中國人認同的比例更是快速的下降，我們應該沒有理由否認臺灣社會的國家認同在這期間確實發生了重大的變化。此外，因為在1992年之前公開表示自己支持台灣獨立宣稱自己是臺灣人會導致更為嚴重的政治後果（前者屬犯法行為），如果我們要針對民主化前後的國家認同進行比較研究，應該也是以分析「臺灣人 vs. 中國人」較分析「臺灣獨立 vs. 中國統一」更為適當。

¹¹ 在1950年代時，外省人約佔當時臺灣人口的20-25%。到了1990年代，外省人的人口比例已經下降到15%左右。所謂的外省人，一般是以父親的省籍背景作為標準，因此排除了本省人娶外省人所生的後代。

12 隨著臺灣的民主化和本土化，臺灣人認同的內涵也開始發生性質的轉變。對很多人來說，臺灣人不再等同於本省人，而是指深受臺灣文化和歷史影響的人，居住在臺灣的人，臺灣（或中華民國）的公民，情感上認同臺灣的人，或者是只要主觀上認為自己是臺灣人的都算是臺灣人。如果「臺灣人」可以是一種個人的政治身份選擇或主觀的情感歸屬，而非一種本質性和難以改變的特質，那麼臺灣人認同的興起應該不必然會產生對少數族群的壓迫。反之，如果大多數人還是用族群的特質（例如血緣、語言、宗教和習俗）來界定臺灣人，則臺灣人認同的興起便將極可能強化外省人的危機意識和引起中國認同者的強烈反彈。

根據一項 1996 年的民意調查，臺灣社會對於何謂臺灣人的看仍然相當分歧。¹³ 在受訪民眾中，有三成左右認為「臺灣人」意指「省籍為本省籍的人」（38%）或「會說台語的人」（22%）；有五成左右認為凡是「在臺灣出生的人」（55%）或「住在臺灣的人」（49%）就是「臺灣人」；此外，也有五成左右採取主觀的界定法，認為只要是「認同臺灣的人」（55%）或是「自認為是臺灣人的人」便是「臺灣人」（39%）。根據作者對立法委員所做的調查，絕大多數政治菁英也是用政治身份或主觀感受來界定「誰是臺灣人」？¹⁴ 在 66 位受訪菁英中，64%認為「臺灣人」指的是「在臺灣出生、居住和/或生活的」人，29%認為「凡是具有臺灣（或中華民國）公民身份者就是臺灣人」。除了採取政治身份或生活地域做為標準之外，也有不少政治菁英認為臺灣人認同應該是一種主觀的情感歸屬。在受訪菁英中，分別有 32%和 17%認為只

¹² 參見林佳龍 1989 和王甫昌 1996。

¹³ 《遠見雜誌》社曾在 1996 年 6 月 16-8 日期間針對臺灣人民進行一項關於國家認同的全國性電話調查，其樣本數為 1031 人，答案為複選。關於研究設計與發現，請參見《遠見雜誌》1996 年 6 月 15 日出版。

¹⁴ 此一訪問執行期間為 1995 年 1 月至 1996 年 4 月。關於臺灣人國族認同的問題，其答案為複選。關於詳細問卷設計與發現，請參見 Chia-lung Lin 1998：第 14 章和附錄 1-3。

要「自我認同是臺灣人」或「具有強烈的臺灣意識者」便是「臺灣人」。相較之下，只有較少數受訪菁英認為「臺灣人」必須是「具有共同血緣的人」（3%）、「會說臺灣話的人」（6%）或是「具有共同的歷史和文化背景的人」（18%）。總結以上發現，雖然臺灣社會對於何謂臺灣人的理解仍然相當歧異，但是大多數人（尤其是政治菁英）經歷了過去幾年的民主化和本土化，已經不再用省籍或其他較嚴格和狹隘的標準來界定臺灣人。而如果臺灣人認同可以是一個具有包容性和發展性的概念，那麼外省人和中國認同者將較無理由強烈抗拒這個興起中的臺灣人認同。甚至可以樂觀的期待，只要民主政治繼續發展下去，即使是具有中國意識的外省人，也可能發展出某種程度的臺灣人認同。

從表一可以得知，不只是本省人，即使外省人的國家認同在民主化過程中也發生了重大的變化。在 1992 至 1996 年短短三年之間，自我認同是「臺灣人」或「臺灣人和中國人」的外省人比例從 23% 加倍成長到 53%；到了 1999 年，這個數字更成長到 70%。對大多數外省人來說，因為要在短期內完全拋棄中國人認同似乎相當困難，一個比較折衷的作法是接受雙重的認同，即界定自己同時是中國人和臺灣人；這可以從認同自己是「中國人」和認同自己是「臺灣人和中國人」兩者在數量上的消長清楚看出。當然，對這些願意接受臺灣人認同的外省人而言，「臺灣人」已經不再是代表省籍的概念，而比較是代表一種生活的地理空間、政治的公民身份或主觀的群體歸屬；至於「中國人」，則主要代表的是分享某種文化或種族的背景（一般稱為華人或漢人），而不必然指涉現代意義的國民國家(nation-state)。表一另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是，雖然本省人明顯較外省人更傾向認同自己是臺灣人，但是多數的本省人並不排斥中國人認同。以 1999 年的調查而言，有高達 52%的本省人仍然自認為既是臺灣人也是中國人。我們有興趣的是，在本省人的認知中，臺灣人和中國人的含意又是如何呢？

表一：本省人和外省人的國族認同及其變化

國族認同：	本省人					外省人	
	1993年	1996年	1999年	1993年	1996年	1999年	
臺灣人	32%	40%	38%	2%	9%	8%	
臺灣人和中國人	35%	40%	52%	23%	44%	63%	
中國人	27%	17%	9%	73%	47%	30%	

資料來源：三次資料皆取自臺灣大學政治系選舉研究工作室針對全國選民進行的面對面調查訪問，有效樣本數分別為 1356（1993 年 2 月）、1357（1996 年 2 月）和 1357（1999 年 2 月），最大抽樣誤差為正負 3%。

根據作者對臺灣政治菁英所做的訪問，多數受訪者傾向用不同的概念來界定「臺灣人」和「中國人」（參見表二）。基本上，「臺灣人」主要指的是生活在臺灣這塊土地上的政治公民（政治／地理標準）或是在心理上對臺灣這個社群有認同感和歸屬感的人（心理／主觀標準），而「中國人」則主要是指稱具有華人或漢人的文化或血緣背景的人（文化／本質標準）或是具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的大陸人民（政治／地理標準）。因為許多人傾向用不同的角度來理解「臺灣人」和「中國人」，因此並不認為存在雙重認同是一件矛盾的事情。如果「中國人」代表的只是華人或漢人的概念，那麼不只對外省人來說，就是本省人也比較容易接受中國人的認同。事實上，在作者的訪談經驗中，大多數認為自己是臺灣人不是中國人的政治菁英都是將中國人理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或是屬於另一個獨立政治社群的人。對他們來說，一個人固然可以擁有或包容多元的文化背景，但是不應具有相衝突的政治認同和效忠，即認同於和自己國家（無論稱為臺灣或中華民國）處於敵對狀態的另一個國家或政治社群。

表二：何謂「臺灣人」？何謂「中國人」？

本省菁英的認知：	何謂臺灣人？	何謂中國人？	人數
政治概念	+	文化概念	=> 15
心理概念	+	政治概念	=> 11
心理概念	+	心理概念	=> 11
心理概念	+	文化概念	=> 7
政治概念	+	政治概念	=> 4
文化概念	+	文化概念	=> 2
文化概念	+	政治概念	=> 2
外省菁英的認知：			
政治概念	+	文化概念	=> 10
政治概念	+	政治概念	=> 1
政治概念	+	心理概念	=> 1
心理概念	+	政治概念	=> 1

註：表中的政治概念包含政治和地理概念，心理概念包括心理和主觀概念，文化概念包括文化和本質概念。

資料來源：受訪者為 66 位立法委員，訪談執行時間為 1995 年 1 月至 1996 年 4 月。參見 Chia-lung Lin 1998。

Michael Walzer (1992) 在研究美國人的認同時曾經指出，當一個人決定淡化自己的族群身份而寧可強調自己的公民身份時，事實上某種新的文化或政治認同就已經逐漸在形成了。¹⁵ 在美國這個多族群的社會中，比較早移入的族群往往只稱呼自己是「美國人」(American)，而比較晚近才移入的族群則較可能稱呼自己是「西裔美國人」(Spanish-American)、「德裔美國人」(German-American)或「亞裔美國人」(Asian-American)。其中的區別在於，

¹⁵ 關於中文文獻對 Michael Walzer 相關思想的介紹，可參見江宜樺 1998: 89-90。

後者雖然承認自己是美國人，但並不願放棄自己先前或祖先的族群和文化認同，至於前者，則是不強調族裔認同的美國人，只以美國公民的身份來界定自己或感到自豪。對於這些不強調族裔背景的美國人(anonymous American)來說，事實上，他們並非沒有文化或民族認同，而是以美國作為他們認同的對象，也因此，一個比較適當的說法不妨稱他們為「美裔美國人」(American-American)；當然，為了避免拗口，一般就將之稱為美國人吧。美國的經驗顯示，即使一個人希望保留自己原先族裔的文化認同，並不必然就會妨礙他和其他公民形成共同的政治認同。事實上，國家認同往往包含文化和政治兩個面向，只是每個人側重的面相不同罷了。用 Walzer 的觀點來看臺灣的認同問題，我們沒有理由否定外省人可能和本省人形成共同的國家認同。比較樂觀的看，只要假以時日，外省人即使不放棄他們的中國人認同，也可能和許多本省人一樣，將中國人視為一種和臺灣人國家認同相容的文化認同。對於這些具有雙重認同的人，我們也許可以視之為「中國（華）裔臺灣人」(Chinese-Taiwanese)，以便和只認同自己是臺灣人者加以區分（作者稍後將進一步分析，和美國情況不同的是，因為控制中國大陸的中共政權對臺灣存有強烈敵意，中國人認同在臺灣要被普遍接受的可能性在短期內似乎不高）。

三、臺灣的領土、人民與主權

雖然臺灣人民對於兩岸關係的終極安排仍未形成共識，但是多數人似乎並不否認臺灣事實上已經是一個獨立的國家。根據一項 1998 年 7 月所做的民意調查，當受訪者被詢問到是否同意「臺灣已經是個主權獨立的國家」時，有 68.3% 的受訪者表示同意，只有 22.7% 不同意。¹⁶從表三可以進一步瞭解

¹⁶ 此一調查為新興民族基金會委託傳訊民調公司所做的電話訪問，有效樣本數為 1027，最大抽樣誤差為正負 3%。另外根據行政院陸委會委託中華徵信社在 1999 年 9 月所做的電話訪問（樣本數為 1067），有 91% 的受訪者同意「中華民國是

臺灣人民如何理解臺灣的國家地位，包括臺灣的「領土」、「人民」和「主權」範圍。在 1996 年初時，臺灣人民對其所屬國家的領土和人民仍明顯缺乏共識。在受訪民眾中，只有四成左右認為「我國」的領土和人民只及於台澎金馬及其島上的 2100 萬人，另有四成左右認為應該包括中國大陸及其 12 億人口。但是在經歷了 1996 年 3 月的總統大選以及中共的文攻武嚇之後，臺灣人民的政治認知發生了不小的變化。1996 年 7 月的調查資料顯示，認為中華民國（或臺灣）的領土和人民只及於台澎金馬及其島上的 2100 萬人者，已經上升到五成多，而認為應該包括中國大陸及其 12 億人口者則下降到只有三成左右。

表三：臺灣人民對「領土」、「國民」和「主權」的認知

問卷題目	1996 年 2 月	1996 年 7 月	1998 年 7 月
1. 領土：您認為我國的領土範圍，只包括台澎金馬，還是應該也包括中國大陸？	41%：42%	51%：33%	65%：27%
2. 國民：您認為我國的人民，只包括台澎金馬 2100 多萬人，還是應該也包括中國大陸 12 億人民？	44%：39%	58%：28%	64%：28%
3. 主權：關於臺灣前途，您認為是只有臺灣人民才能決定，還是中國大陸的人民也有權利參與？	---	73%：13%	81%：13%

註：表中數字「X：Y」表示認為臺灣的領土、人民和主權範圍「只在臺灣：包括大陸」的比例。
資料來源：1996 年兩次調查資料得自臺灣大學政治系選舉研究室（樣本數分別為 1376 和 1406），1998 年資料得自傳訊民調公司電話訪問（有效樣本數為 1027），三次調查皆符合 95% 信心水準的抽樣檢定。

根據 1998 年 7 月的另一項調查，認為中華民國（或臺灣）的領土和人民只及於台澎金馬及其島上的 2100 萬人者，更上升到六成五左右。當被問

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只有 12% 同意「臺灣是中國的一部份，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全中國的唯一合法代表」。

到「關於臺灣前途，您認為是只有臺灣人民才能決定，還是中國大陸的人民也有權利參與」時，更有高達八成以上的民眾認為只有臺灣人民才有權決定臺灣的前途。如果一個國家的構成要件主要包括人民、土地和主權，則以上的發現顯示多數臺灣人民並未否定中華民國在臺灣是一個獨立的國家，即使他們對於這個國家的國號有不同的偏好以及對是否應該宣佈獨立仍有歧見。

表四：不同國家認同者對「領土」、「國民」和「主權」的認知

問卷題目：	我是臺灣人 n=557		我是臺灣人 和中國人 n=605		我是 中國人 n=208	
領土：						
我國領土只包括澎湖馬		66%	46%	32%		
我國領土還包括中國大陸		15%	42%	56%		
國民：						
我國人民只包括澎湖馬 2100 多萬人		72%	52%	41%		
我國的人民還包括中國大陸 12 億人民		11%	36%	47%		
主權：						
只有臺灣人民有權決定臺灣前途		81%	70%	64%		
中國大陸人民也有權利參與決定臺灣前途		5%	17%	25%		

資料來源：同表三 1996 年 7 月調查。

作者在其他研究曾經指出，即使是中國認同者和統一支持者也有相當一部份（約五成左右）並不否認臺灣（國號稱為中華民國）事實上已經是一個獨立的國家。¹⁷ 表四也顯示，即使是在中國認同者中（包括自認是臺灣人和中國人者），也有接近五成認為國家的領土和國民並不包括中國大陸和所屬的 12 億人口。當被問到誰有權決定臺灣的前途時，更有高達六成多認為中國大陸的 12 億中國人並無權利參與決定臺灣的前途。雖然如此，我們仍

¹⁷ 參見 Chia-lung Lin 1998: 526。

然關心臺灣人民是否能夠接受用民主的程序來解決國家認同的爭議。表五的資料顯示，大約有六成左右的民眾已經可以接受用公民投票的方式來解決統獨的爭議，至於持反對意見者則有兩成左右。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是中國認同者，也有半數左右可以接受公民投票的正當性。¹⁸ 必須指出的是，有些人（尤其是政治菁英）之所以對公民投票有所保留，並不一定是因為反對以民主程序來解決政治問題，毋寧是不希望太快用公民投票此一零合的方式來「解決」國家認同的爭議。¹⁹ 比較令人鼓舞的是，表五第二列的資料顯示，當被問到「如果公民投票的結果和您的統獨立場不合時，請問您是否會接受公投的結果」時，只有二成持保留態度，另外的七成民眾則表示會接受公投的結果。

表五：臺灣人民對用公民投票解決統獨爭議的態度

問卷題目：	1993 年 2 月	1996 年 2 月	1998 年 7 月	1999 年 2 月
1. 請問您贊不贊成用公民投票的方式來解決統獨的爭議？	52%：28%	56%：23%	60%：34%	61%：23%
2. 如果公民投票的結果和您的統獨立場不合時，請問您是否會接受公投的結果？	---	---	70%：20%	---

註：表中數字「X：Y」表示「贊成：反對」的比例。

資料來源：同表三。

¹⁸ 根據表五 1999 年 2 月的調查，在 160 位自我認同是中國人的受訪者中，分別有 79 人和 56 人持贊成和反對用公投決定未來臺灣前途是統是獨；此外，在 702 位自我認同是就中國人也是臺灣人的受訪者中，分別有 418 人和 180 人持贊成和反對立場。

¹⁹ 舉例來說，在接受作者訪問的 66 位立委中，有 77% 表示即使公投的結果和他們的統獨立場不同，他們也會接受公投的結果，但是其中有 24% 認為應以漸進的方式等時機成熟時再舉行公投。參見 Chia-lung Lin 1998: 529。

貳、民主轉型與國族形成

當臺灣社會愈來愈多人宣稱他們是臺灣人時，一個新的國族認同事實上已經悄悄在形成中。雖然不同族群對「臺灣人」的理解仍不一致，但確是在朝共同的方向演進。即使是外省人和中國認同者，現在的問題也不再是要不要接受臺灣人認同的問題，而是要如何調合臺灣人認同和中國人認同的問題。經過十年的政治民主化，對臺灣社會來說，「臺灣人」已經可以是一個具有包容性和發展性的概念，一個人可以直接稱呼自己是臺灣人，也可以表示自己是中國人也是臺灣人。即使對兩岸統獨關係的終極安排仍有歧見，多數人也已經承認臺灣是一個具有國家性質的政治社群，並且願意接受以民主程序來決定臺灣的前途。總的來看，這個興起中的臺灣人認同主要是一種以公民身份而非族群背景為構成原則的政治認同，並且是一種性質上與自由主義和民主主義相容的國家認同。²⁰

當代研究民族主義的學者大多同意，「民族」是人們「想像」(imagine)、「發明」(invent)或「建構」(construct)的產物，並非客觀存在和永恆不變的本質性實體。²¹但兩個關鍵的問題是，什麼因素在影響人們對民族的想像？以及為何人們會有不同的民族想像？關於第一個問題，Benedict Anderson(1991: 37-46)告訴我們，印刷資本主義(print-capitalism)的興起在民族形成過程中的重要性；Ernest Gellner(1983: 1-7)強調是民族主義產生了民族，而民族主義的原則主要是在追求政治疆界和民族疆界的一致；E. J. Hobsbawm(1990: 10)更進一步指出，是國家創造了民族，而非民族創造了國家。關於第二個問題，Rogers Brubaker(1992, 1996)的研究可以提供一些理解的線索。透過研究德、法兩國民族主義和國籍政策以及前蘇聯集團瓦解之後

²⁰ 關於臺灣學界對自由主義式的民族主義之意義之研究和呼籲，可參見吳乃德 1996 和江宜樺 1998。

²¹ 例如，Benedict Anderson 1991; Ernest Gellner 1983 和 E. J. Hobsbawm^m 1990。

的民族主義運動，Brubaker 探討國家形成(state-building)的過程和經驗（例如革命、戰爭和政體的制度安排等）如何影響人們對民族的想像以及公民權的界定。例如，受到革命和共和思想的影響，法國人主要是用國家的制度和領土架構來界定民族，並且致力於對少數族群和移入者進行文化的同化。反之在德國，因為民族意識的發展先於國家建立，人們傾向用語言、文化或種族而非政治的角度來界定德國民族。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德國人對民族的理解還受到法國民族主義運動的影響。當 19 世紀初期德國人正在追求本身的民族認同時，正面臨著法國革命以及啟蒙運動的理性主義(rationalism)和世界主義(cosmopolitanism)的衝擊，而德國知識份子為了抵擋外來文化的入侵，轉而以歷史和文化特殊主義(particularism)來界定德國民族；有趣的是，德國人強調特殊主義的民族主義論述反而進一步強化了法國人民族主義的普遍主義(universalism)內涵。

為什麼臺灣人認同會在這些年來快速興起，並且發展成一種帶有自由主義和普遍主義色彩的公民民族主義呢？換句話說，假如國家認同或民族認同是想像、發明或建構出來的，那麼為什麼會有愈來愈多的人想像自己是臺灣人，並且用公民身份或較具包容性的標準來界定臺灣人呢？要回答這些問題，似乎無法只從社會漸進演化的角度來解釋，因為一個社會的認同會在這麼短的時間內發生如此巨大變化，顯然和外在環境尤其是政治環境的變動有密切關係。如果說國家建立會影響民族的建構，那麼在臺灣這些年來和國家建立最有關係的兩個力量無非就是島內的政治民主化以及來自海峽彼岸的戰爭威脅。

在另一方面，政治民主化，尤其是選舉所帶動的政治參與，將臺灣人民不分族群地共同捲入了一個以臺灣為疆界的「建國」過程，這個政治參與的過程不但有助於形塑以憲政制度為基礎的集體認同，而且使社會各部門和團體有機會進行觀念的溝通和利益的交換，進而形成一個命運和利害的政治共同體。用 Ernest Renan 的話來說，如果一個民族的存在是表現在類似「每日公民投票」(daily plebiscite)的實踐上 (John Hutchinson and Anthony Smith, eds.

1994: 17-8)，那麼民主生活所創造的公共領域(public sphere)和交疊共識(overlapping consensus)正是在發揮每日公民投票的作用，它深深影響臺灣人民的民族想像。另一個形塑臺灣人民民族想像的政治力量是戰爭的陰影。隨著臺灣的民主化，臺灣和中國大陸的交流也日益頻繁，但是在隔離四十年之後重新交往的過程中卻也呈現了兩個社會迥異的價值觀和制度。更重要的是，因為中國大陸並不放棄武力統一臺灣，兩岸的交往反而使臺灣人民更加體會到來自彼岸的敵意和威脅。持續的兩岸互動，使臺灣人民逐漸滋長出一種同仇敵愾的情緒，以及休戚與共的感受。為了保護辛苦掙得的自由和幸福，人們不得不捐棄內部成見，置國家安全於黨派和族群的利益之上。這種共同的苦難經驗，就像共同的榮耀一樣，都是民族形成的重要力量。再次引用 Renan 的話，分擔共同的苦難實際上比分享共同的榮耀在一個民族形成的過程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因為苦難遭遇會呼喚義務並要求共同的努力，而這些經驗日後都將成為人們生命中難以磨滅的集體記憶。

一、民主化與群眾參與的制度化

我們可以從群眾和菁英兩個層面來分析民主化對國族認同的影響。在群眾的層面方面，政治民主化，特別是全國性選舉的開放，發揮像漩渦的作用，將全體臺灣人民捲入了一個共同的政治過程，驅使先前具有不同利益和認同的社會群體進行對話、諮商和妥協。民主化帶來了政治社會的開放(opening of political society)，透過參與政黨和社會運動、接觸政治人物、閱讀大眾傳播媒體以及和親友同事公開討論公共事務等等，一般社會大眾可以具體感受到彼此之間存在著一個共同的政治社群。頻繁的選舉對人們的衝擊尤其深遠。從提名、競選到投票，整個社會的焦點都鎖定到同一件事務上；在這個過程中，候選人推出各種議題和活動來吸引選民的注意，媒體除了密集採訪之外還以各種節目（包括 call-in）來討論選情，而人們無論在家中、學校、公司甚至在計程車上，都可能發表自己對選舉的看法。可以這麼說，臺灣在過去

十年以來，最能引起人們普遍關注的政治事件無疑地就是選舉，在這期間，幾乎每年都有重要選舉，而每次選舉從提名到投票差不多都涵蓋半年以上的時間。如果說，一個新興民族的出現必須藉由某些共同儀式來表現和凝聚集體的意識，那麼在臺灣，應該沒有比選舉在動員頻率、廣度和強度上更讓人印象深刻的集體儀式。可以想像的是，當臺灣人民定期地在一起選舉總統和國會的時候，事實上也就是在認可一個共同歸屬的國家的存在，以及接受以這個國家作為計算多數決的疆界。換句話說，政治民主化預設國家的存在，而人們在共同參與國家事務的過程中也正是在共同形塑一個想像的民族。

表六：臺灣人民如何評估1996年總統大選的政治效應

問卷題目：	我是臺灣人		我是中國人		合計	
	n=557	n=605	n=208	n=1406		
1.這次選舉的過程與結果是否帶動臺灣民主的進步？	80% : 5%	81% : 9%	85% : 8%	81% : 7%		
2.這次選舉的過程與結果是否造成社會人心的不安？	20% : 65%	26% : 63%	26% : 65%	23% : 64%		
3.這次選舉的過程與結果是否增強臺灣兩千一百萬人的主體意識？	71% : 6%	74% : 9%	78% : 12%	73% : 8%		
4.這次選舉的過程與結果是否激起省籍與族群的對立？	17% : 58%	15% : 70%	20% : 72%	17% : 65%		
5.這次選舉的過程與結果是否強化政府權力的正當性？	64% : 9%	68% : 12%	73% : 13%	66% : 11%		
6.這次選舉的過程與結果是否增強國際社會對臺灣的支持？	76% : 3%	79% : 6%	84% : 7%	77% : 5%		

註：表中數字「X: Y」表示「贊成：反對」的比例。

資料來源：同表三 1996年7月調查。

表六的資料可以證實選舉對臺灣政治發展具有非常重大和正面的影響

響。當被問到如何評估 1996 年總統大選的政治效應時，有 81% 的受訪民眾認為該次選舉帶動了臺灣民主的進步，73% 認為增強了臺灣人民的主體意識，66% 認為強化了政府權力的正當性，77% 認為增強國際社會對臺灣的支持。反之，只有二成左右認為該次選舉造成社會人心的不安或激起省籍與族群的對立。一項重要的發現是，即使在具有中國人認同的受訪者中，對總統大選的政治效應也有相當正面的評估。此外，根據作者對 66 位立委所做的訪問，有八成的受訪菁英也認為，「由民主方式產生的政府，會使所有的公民，無論族群或政治信念有何不同，都對國家產生一種忠誠的感情」。²²

民主在臺灣的實踐除了使人們因為共同參與「全國性」事務而在無形中接受以「臺灣」為正當的政治疆界，也提供了一個公共場域，讓人們可以相互溝通和瞭解，以共同的遊戲規則來解決不同團體之間利益和認同的紛爭。換句話說，人們接受民主不只是因為在抽象層次肯定它的價值，還因為民主可以用來有效解決社會內部各種利益的衝突。經過多年的民主化，對大多數人來說，「臺灣」不再只是一個地理名詞，而是一個具有國家性質的政治實體，而「臺灣人」也不再是特定族群的代名詞，而是一種政治公民的身份認同。用 Anderson 的名言來說，如果民族是一種「想像的社群」(imagined community)，那麼經過民主化的洗禮，臺灣人民基本上是用和民主國家相關的概念來建構這個共同政治社群的疆界和內涵。因為在政治、經濟和社會生活中自成一體，臺灣人民對於何謂「國內」和「國際」事務，實際上是具有相當高的共識，那就是，無論是現在或可見的未來，有權參與建構這個社群想像的主要是臺灣島上的人民，並不包括海峽對岸的 12 億中國人。

二、民主化與政治菁英的馴化

民主化除了影響一般群眾的國族認同之外，也影響政治菁英在進行認同

動員時的計算。誠如 Juan Linz 和 Alfred Stepan(1996)指出，政客是希望和悲怨的動員專家，分析政治菁英有助於瞭解認同政治的演變與發展。簡單的說，臺灣的民主化（特別是選舉競爭）已經根本改變了政治菁英互動的機會結構(opportunity structure)和誘因結構(incentive structure)。臺灣在民主化之前，因為國民黨政權是一個由少數外省人控制的外來政權，本土的反對者長久以來便技巧地運用族群矛盾的情緒來進行群眾動員（在當時，太直接的族群動員仍是政治禁忌）。²³在民主化開始之後，認同動員在臺灣有了更進一步的發展。和南斯拉夫、蘇聯以及波羅地海三小國等地的經驗類似，當一個威權或極權國家一旦發生鬆動，民族主義議題往往成為反對者（甚至是一個威權或極權國家的自然選擇。這主要是因為反對勢力在此時往往還極為脆弱並且欠缺制度化的組織管道來匯集社會中複雜的利益，因此，民族主義便成為非常廉價、快速和有效的動員訴求。臺灣的情況也不例外。統獨議題隨著民主化浮上政治舞臺，並且很快就導致了政黨的重組，主張中國民族主義的新黨和臺灣民族主義的建國黨相繼成立。但也必須指出的是，無論是中國民族主義或臺灣民族主義的動員力，在民主化的後期，似乎都遇到了發展的瓶頸。緊接著，我們看到的是國民黨、民進黨和新黨等政黨的領導菁英都對民族主義的論述展開修正，而且其基本方向都是朝公民民族主義的方向調整。為什麼政治菁英會在民主化的後期淡化族群群動員、轉而強調建立以公民權為基底的臺灣人認同呢？回答這個問題，除了分析臺灣社會結構和性質的演變之外，還必須從選舉競爭的邏輯中去尋找政治性的解釋。

對政治菁英來說，要在臺灣進行族群民族主義動員所遇到的第一個挑戰便是相當比例的民眾同時具有臺灣人和中國人認同以及支持臺灣地位維持現狀（即既不和中國大陸統一也不在法律上宣佈臺灣獨立）。選舉競爭使各

²³ 關於菁英動員和臺灣認同興起之間的關係，請參見：林佳龍 1989, 1998; Alan Wachman 1994; Nai-teh Wu 1996; 王甫昌 1996; Tun-jen Cheng and Yung-ming Hsu 1996 和 Yun-han Chu and Tse-min Lin 1996。

黨派菁英必須更加重視「民意」。因為支持統一和支持獨立的民眾皆未過半數，這些具有雙重認同或主張維持現狀的「中間選民」便成為左右政治菁英思考的重要因素。首先就新黨來說，族群動員顯然不是長久之策，這除了因為外省人只佔臺灣人口的15%左右，也因為新黨目前的支持者中有將近一半是本省人。²⁴對民進黨而言，在國民黨政權於李登輝領導下完成了本土化之後，也很難再用族群矛盾來區分兩黨的界線；事實上，過度的族群動員反而可能阻礙臺灣民族主義的建立。這主要是因為經過近半世紀的社會整合，經由通婚、同學和工作所建立的關係，大多數本省人都有外省籍的親戚、朋友和鄰居。在一個現代化和流動的社會中，交錯的人際關係往往使建立在族群本質上的民族主義動員變得非常困難。Juan Linz(1985: 203-53)在深入研究西班牙的民族主義運動之後即曾得出以下結論：在一個不同族群混居的異質社會中，因為要建立一個以原始關係為連結的民族國家，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話，也是代價太大，因此，大多數原先強烈主張族群分離的民族主義份子，最後都不得不轉而強調以地域作為建立國家的基礎，即使族群動員在民族主義發展的初期曾經發揮極大的作用。

對族群民族主義動員的第二個挑戰是多重和交錯議題的出現。一些經驗研究指出，臺灣在民主化之後，許多經濟和社會議題（例如社會重分配、腐化、環境保護和性別等議題）已經繼國家認同問題之後浮上政治舞臺，並且彼此互相切割，因此限制或削弱了政治菁英進行族群動員的可能性。²⁵因為不同政黨在不同議題上有「相對優勢」(comparative advantage)，並且可以在立法過程中組成各種「贏的聯盟」(winning coalition)，臺灣的政治已經不是一種零合的遊戲。尤其對民進黨和新黨來說，因為光是強調民族主義無法成為絕對多數，為了獲得勝利，都不得不尋找另外的議題以便和其他勢力

結盟，甚至乾脆調整原先的民族主義論述，向中間立場移動，以尋求多數選民的支持。近來民進黨和新黨倡導族群「大和解」以及屢次在經濟和社會改革議題上結盟，正是反映出以上菁英聯盟(elite coalition)和菁英匯合(elite convergence)的政治邏輯。²⁶可以想像的是，當民進黨和新黨菁英都需要對方在某些議題上支持時，自然也就較難標準族群式的民族主義。誠如 David Truman(1951)和 Seymour Lipset(1960)指出，在一個存在交錯社會分歧的政策體系中，人們傾向採取較緩和的政治立場，因為他們必須面對多重認同或利益的交叉壓力(cross-pressure)。而如 Arend Lijphart(1977: 71-87)和 Giovanni Satori(1987: 223-7)所言，一個存在多重和交錯議題的政策體系基本上會有利於民主政治的穩定發展。

參、國際關係與民族形成

戰爭和近代國家的形成有非常密切的關係。用 Charles Tilly(1975)的話說，國家製造戰爭，戰爭也製造國家。因為戰爭乃生死大事，為了求勝，人們必須將資源和權力集中起來，並且強化對領袖的效忠，以採取一致的行動，這些都有利於國家的形成。事實上，戰爭不只製造國家，也製造民族，因為戰爭會使人們產生休戚與共、同仇敵愾以及集體的認同感。以臺灣的情況來說，長期面臨來自中共的戰爭威脅，無疑地對臺灣的國家形成和民族形成影響深遠。

在1980年代之前，兩岸的對抗主要是國、共兩個政權在爭奪對「一個中國」的代表權。在國共對峙的情況下，國民黨並不允許臺灣人民和對岸的中國人接觸。這種隔離隨著臺灣的民主化已經不復存在。但值得注意的是，兩岸恢復往來不但沒有促成兩個社會的和解，反而突顯兩岸人民在各種價值觀上的歧異。更重要的是，中共因為害怕臺灣在民主化之後走上獨立因此極

²⁴ 詳見 Chia-lung Lin 1998: 424。

²⁵ 參見 Yun-han Chu and Tse-min Lin 1996; Tse-min Lin, et. al. 1996, 1996a 和林佳龍 1998。

²⁶ 關於近年來各政黨在立法過程中的結盟及其結果，可參見林佳龍 1998。

力打壓臺灣，反而造成臺灣人民普遍的反彈。這個發展可以從臺灣人認同和臺灣獨立的呼聲不降反升，看出端倪。資料顯示，每當兩岸處於緊張局面時，臺灣人民便能感受到來自對岸的敵意，並會表現出較強烈的臺灣人認同，也較可能支持臺灣獨立。²⁷ 以下先報告一些相關資料，然後再提出解釋。

兩岸關係在 80 年代末期和 90 年代初期開始發生重大變化。先是蔣經國總統在去世前開放民間層次的探親和交流，然後是李登輝總統宣佈結束動員戡亂時期，間接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中華民國是兩個互不隸屬的國家。從圖二的資料可以發現，²⁸ 在 1992 年中共迫使南韓和中華民國斷交之前，認為兩岸處於敵對關係以及自認為是臺灣人或支持臺灣獨立的受訪者比例並不高，大約在兩成以下。稍後，隨著兩岸敵對關係的升高，臺灣人認同和台灣聲浪也快速上漲。在 1993 年間，兩岸的政治互動更加頻繁，先是兩岸在新加坡舉行第一次辜汪會談，接著是臺灣朝野開始共同推動加入聯合國運動，然後是中共發表帶有敵意的《對台政策白皮書》以及在國際上發動對臺灣的打壓和孤立。1994 年發生的「千島湖事件」是另一個重要的轉折點。在這個事件中，24 位到大陸旅遊的臺灣人民被槍劫和謀殺。因為據報導中共解放軍介入了此一謀殺事件，再加上中共當局為了湮滅證據迅速將受害者的屍體焚毀，引起了臺灣人民普遍的憤怒。根據民意調查，有 70% 的受訪者認為此一事件已經嚴重傷害臺灣人民對大陸的感情（《聯合報》1994 年 4 月 18 日）。從圖二資料可以看到，57% 的受訪者認為兩岸當時處於敵對關係，而認同自己是臺灣人和支持臺灣獨立者的比例更分別上升到 41% 和 33%，這兩個數字首次超過了認同自己是中國人和支持中國統一者的比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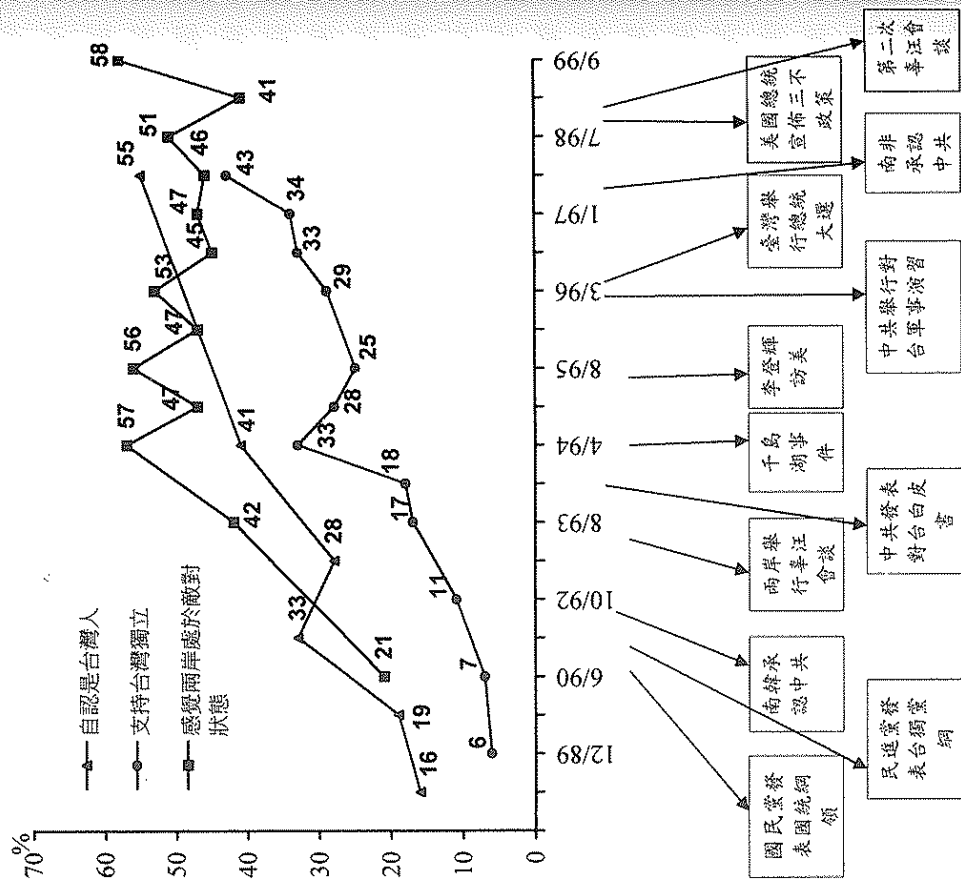
千島湖事件對臺灣人民國家認同的轉變有相當大的影響。首先，臺灣人民經過這個事件的衝擊，更加體認到兩個社會對人權和法治的看法存有極大

的鴻溝。再者，這個事件也讓臺灣人民體會到無論是本省人或外省人，在大陸人民的眼中，皆是所謂的「台胞」，而這種身份也使他們必須承擔共同的苦難。臺灣人民對屬於一個命運共同體的感受在 1995 至 1996 年間更為深刻。當李登輝突破封鎖在 1995 年 6 月成功訪問美國之後，中共開始對臺灣展開一連串的文攻武嚇，甚至數次在臺灣海域發射飛彈，企圖影響臺灣的總統大選。不過事情並沒有朝中共預期的方向發展。選舉結果，李登輝以 54% 的選票高票當選總統。如果進一步把支持李登輝的選票和支持彭明敏（民進黨候選人）的選票加總起來，那麼臺灣每四個選民當中就有三位以具體行動向中國的威脅說「不」。如果說一個民族必須要有某種集體的記憶，那麼臺灣人民在外敵威脅下順利完成總統直選的經驗，無疑地已烙印在許多人的內心深處。

經過這次總統大選的衝擊，臺灣人民的國族認同明顯產生了量變和質變。因為臺灣至此已經成為一個民主的國家，包括國家元首和國會議員皆由臺灣人民選舉產生，不但國民黨政府無法再宣稱代表中國，中共政權也無法再宣稱代表臺灣。雖然中共仍然企圖矮化臺灣為其一省，否認中華民國的存在，但是絕大多數臺灣人民並不接受中共的主張。根據一項民意調查（參見表七），經過中共文攻武嚇的洗禮，絕大多數臺灣人民不分國家認同皆減弱了對統一的憧憬，並且認為如果中共武力犯台，臺灣人民也能放下統獨爭議，團結一致保衛臺灣。此外，絕大多數人民也認為，即使面對中共武力犯台的威脅，臺灣也不能接受中共主張的「一國兩制」或是停止擴展臺灣在國際上的生存空間。

²⁷ 此一現象亦可做行政院陸委會多年來委託的調查研究結果中獲得證實。

²⁸ 圖二資料引自《聯合報》所做的電話民意調查，每次訪問的樣本數大約在 1000 個左右。



圖二：兩岸關係和自認是臺灣人及支持臺灣獨立者的變化(1989-1999)

表七：1996年總統大選對臺灣人民國族認同的影響

	我是臺灣人 n=379	我是臺灣人和中國人 n=368	我是中國人 n=298	合計 N=1045
1. 在您認為，中共一連串的軍事演習會強化還是減弱臺灣人民和中國大陸統一意願？	9%：62%	9%：59%	15%：66%	11%：62%
2. 如果中共入侵臺灣，您認為臺灣人民是否可能放下統獨爭議，不分黨派團結一致共同保衛臺灣？	63%：18%	65%：18%	73%：17%	67%：18%
3. 如果中共以軍事威脅要求臺灣接受「一國兩制」，您認為臺灣人民應該接受此一方案還是抗爭到底？	2%：78%	3%：72%	8%：70%	4%：74%
4. 面對中共的軍事威脅，您是否同意臺灣應該停止提昇本身的國際地位（例如參加聯合國），以免激怒中共？	18%：65%	22%：60%	30%：59%	23%：62%
	(9%：74%)	(11%：77%)	(14%：70%)	(9%：74%)

註：表中數字「X：Y」表示「贊成：反對」的比例。

資料來源：民進黨中央黨部民意調查中心電話訪問，1996/3/9-10。括號內數字為臺灣大學政治系選舉研究工作室於1999年所做的調查（參見表一的資料來源）。

經過十多年來的交往，臺灣人民已經普遍理解到兩岸在制度和價值上存在著巨大差異，而這種差異似乎不是短時間內可能消除的。這種差異對我們理解臺灣人認同的內涵有相當的重要性，值得進一步探討。根據1998年的

一項民意調查，²⁹ 大約有四分之一以上的臺灣民眾在過去十年內曾經到過中國大陸，其中 16% 是爲了返鄉探親，59% 是爲了觀光旅遊，另外的 25% 則是因爲生意上的往來。在去過大陸的這些人中，有多達 41% 表示對大陸人民有不好的印象，只有 30% 表示印象還算可以，其他則表示無特別印象。以上的發現相當程度說明，兩岸的問題除了涉及政治上的矛盾之外，應該也和社會文化層面的差異有關。在兩岸開始大規模交流之前，臺灣人民雖然已經感受到中共政權的敵意，但是對大陸人民一般並無惡感，甚至認爲彼岸的中國人也是「同胞」。這種認知在兩岸交流之後產生明顯的變化。許多到過中國大陸的臺灣人民，除了更深切感受到大陸的落後之外（大陸人民的平均國民所得大約只有臺灣人民的十分之一），往往也因爲親身接觸到大陸人民比較負面的行爲而對自己先前浪漫的中國情懷產生懷疑。舉例來說，一些返鄉探親的外省人常常抱怨大陸的親友並不是真心對待他們，而是希望從來往中獲取物質利益；一些在大陸經商的臺灣人也認爲大陸人民的自私和鬥爭性格很強，不好管理；此外，到大陸旅遊的臺灣人也往往認爲大陸人民比較欠缺公德心和法治精神。雖然這些認知可能帶有誤解的成分，而且在許多大陸人民的眼中臺灣人的本質（尤其是台商在大陸的行爲）也好不到那裡去，但是我們確實可以從許多事例中察覺到兩岸人民在某些價值和行爲上的差異。這種社會文化層面的差異，再加上政治上的緊張關係，使很多臺灣人民不願意再將大陸人民視爲休戚與共的同胞。

一個明顯的例子是臺灣人民對這幾年前後幾次大陸水患的反應截然不同。相較於在 1990 年代初期時對大陸水患慷慨捐獻，當 1998 年中國大陸再次發生大規模水患時，臺灣人民的熱情差不多已經消失殆盡，不但民間（包括慈濟功德會）的捐款和援助銳減，甚至連媒體的報導也大爲減少。另一個重要的事件是中共對臺灣 921 大地震的反應。雖然臺灣在這個地震中死傷損失慘重，但是中共並沒有因此停止在國際上對臺灣的打壓。中共官員不但要

求各國紅十字會對臺灣的賑災必須經過北京當局的同意，表示「別人給小孩糖吃時，總得給大人打聲招呼吧」，甚至不准俄羅斯救援隊的飛機經過大陸領空到臺灣救災。此外，中共也堅持臺灣無權尋求包括世界銀行和世界衛生組織等國際性組織的救助。中共這種政治掛帥、無視人道的強硬作法，普遍引起了臺灣人民的反感。根據一項事件後的民意調查顯示，有高達 73% 的受訪者對中共在震災期間對臺灣的反應表示反感（其中 59% 表示強烈反感），而表示好感者只有 6%。³⁰

對大多數臺灣人民來說，和彼岸的「中國」或「中國人」接觸的經驗似乎是以不愉快的經驗居多。這種不愉快的感受自然會削弱臺灣人民對中國的認同。如果在臺灣人民的日常生活中，「中國」代表的只是落後與壓迫，而非光榮與幸福，自然很難期待他們熱情地擁抱中國人認同。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大陸官方的中國民族主義在相當程度上是以反美、反日等情緒作爲發展的基礎，然而臺灣人民卻是普遍對美、日等國存有好感。除此之外，臺灣人民逐漸放棄中國人認同應該也和中共壟斷對「中國」的解釋權以及用中國民族主義壓迫臺灣有關。根據中共的官方說法，「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唯一合法政府，臺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份」。在種論述之下，中華民國是一個已經消失的國家，而臺灣也不具有國際的人格。因爲中共不但不願承認在臺灣的中華民國也是另一個中國，甚至威脅要以武力吞併臺灣，自然很難驅使臺灣人民擁抱中國民族主義。誠如中華民國前任外交部長胡志強一度感慨地指出，「零邦交，零統一」，意指中共在外交上對臺灣的打壓只會使臺灣人民更不願意和大陸統一（《中國時報》1998 年 12 月 31 日）。在臺灣人民因爲面臨來自彼岸中國的威脅而逐漸退去中國人認同時，臺灣的民主化適時地提供了一個臺灣人民集體認同的出處。作者先前提到，民族國家認同除了源於共同的苦難之外，也源於共同的榮耀。歷史經驗

²⁹ 資料來源同註 16。

³⁰ 環球電視和《新新聞週刊》委託山水民調公司調查。參見《中國時報》，1999 年 10 月 4 日。

顯示，當一個國家面臨重大的危機時，往往需要集體認同來凝聚民心士氣，此時民族主義往往成為自然的選擇。臺灣也不例外。但必須解釋的是，臺灣人民為什麼是選擇臺灣人認同而非中國人認同來凝聚民心士氣？可以想像的是，如果臺灣人民和中國來往的經驗大多是負面的，而且又被排除參與對中國民族主義的建構，那麼臺灣人民只好在中國人認同之外尋找其他的集體認同。臺灣人認同在此時的興起無疑地和這種集體認同的需求有關。值得注意的是，在這種情境之下，如果臺灣人認同仍然是一種狹隘的本省人族群認同，那麼顯然無法為外省人和先前的中國認同者所樂意接受，也很難成為全體人民團結一致抵抗外敵的認同武器。但或許幸運的是，臺灣即時的民主化使得「臺灣人認同」要從族群概念轉化到公民概念比較沒有困難。事實上，從抵抗外敵的角度來看，公民民族主義也是一個比較合理和可能的選擇。這是因為公民民族主義強調自由和民主等價值，而這些價值不但能用來區辨臺灣和中國的差異，作為臺灣人民保家衛國的精神武器，而且提供了建構臺灣人認同所需要的理性基礎和榮耀感。從政治邏輯的角度來看，似乎外部的推力（即中共的威脅）和內部的拉力（即民主化）都在促使臺灣人民的國家認同朝公民民族主義的方向發展。

肆、臺灣公民民族主義的未來

許多人擔心民族主義不利於分裂社會的民主鞏固。但是民族主義是否不利於民主鞏固，關鍵在人們如何理解「民族」一詞。如果民族指的只能是種族或族群，而每個種族或族群都企圖建立一個獨立的國家，那麼我們所處的世界勢將充滿更多的衝突和死亡。如果民族可以是一種政治性的概念，指涉公民對政治社群或國家的認同，那麼民族主義不但不會危害民主的穩定，甚至會有助於民主的發展。這是因為任何民主體制的運作都必須存在一個穩定的政治疆界（即政治社群或國家），才能有效地施行「多數決」，計算誰贏誰輸；如果人們對所處的政治疆界毫無共識，都用對自己最有利的疆界來計

算「多數決」，那麼自然不會產生穩定的民主。³¹反之，如果人們不但對政治疆界的範圍有共識，並且對所處的政治社群或國家有高度的認同感，那麼自然有助於民主政治的穩定發展。事實上，無論是民主政治或自由主義的理論都預設存在一個具有固定疆界和人民的政治社群（國家）。當然，這個政治社群的疆界可能變遷，其人民也可能增減，但是參與者對它的範圍以及更改方式基本上應該具有一定的共識。

隨著民主化的進展，絕大多數臺灣人民（包括外省人）已經可以接受並且習慣於以臺灣作為實踐民主的疆界。更重要的是，大多數人同意，如果必要的话，可以用民主的程序來解決對統獨的爭議。如果人們可以接受臺灣的民主，那麼應該就沒有困難接受臺灣是一個國家，因為民主在臺灣的實踐便預設臺灣是一個國家（雖然這個國家在國際上並不一定會被正式承認）。如果民主的正當性能夠更深入人心，那麼或許可以預期臺灣人民最後可以形成像美國人民一樣以公民權為基礎的國族認同。當然，並非每個國家都能像美國一樣幸運地發展出公民民族主義。有些國家，像最近的南斯拉夫，因為民族主義的衝突夾雜著難解的種族和宗教矛盾，很難期望它會發展出公民民族主義。相較之下，臺灣的發展經驗顯然較為幸運。在臺灣民族主義興起的過程中，因為同時開始施行民主政治，加上兩岸持續的敵對關係，使新出現的臺灣人認同帶有強烈的公民民族主義色彩。基本上，我們可以從臺灣政治菁英的論述和行動中，證實這種良性的發展趨勢。

一、國民黨的民族主義論述

臺灣各種民族主義論述的演變和國民黨政權的轉型有密切的關係。在李登輝的領導下，國民黨在最近幾年經歷了徹底的民主化和本土化。國民黨政權的轉型除了表現在權力結構的變化上，也反映在意識形態和政策的調整，

³¹ 參見 Dankwart Rustow 1970: 350-2; Robert Dahl 1986: 122, 1989: 207-9; Yael Tamir 1993: 137; Juan Linz and Alfred Stepan 1996: 16-36。

包括對國家定位和國家認同論述的調整（參見表八）。在國家定位方面，李登輝採取了務實的策略，一方面逐步拋棄對中國代表權的爭議，一方面對中華民國的國家範圍進行重新的解釋，使其適合臺灣政治發展的需要。首先，李登輝在 1988 年繼承蔣經國之後不久即決定面對中國分裂的事實。李登輝先是在 1989 年突破蔣經國生前所設定的「三不」政策（即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派出官方代表出席在北京舉行的亞銀年會，以行動承認北京政府，和「兩個中國」，接著又在 1991 年宣佈結束動亂時期，繼而成立陸委會和海基會等機構和北京政府進行協商談判。而當兩岸在 1993 年於新加坡舉行辜汪會談展開關係正常化的同時，李登輝同時也決定發起「加入聯合國運動」，以行動尋求國際社會重新承認在臺灣的中華民國。隨著國內民主化的深化，李登輝開始巧妙地將中華民國稱為「中華民國在臺灣」，並且在官方談話中交互使用「中華民國」和「臺灣」。

表八：國民黨和民進黨關於國族認同與國家定位論述的演變

日期	行動者	事件
1983.11	黨外	民進黨前身「黨外中央後援會」提出「臺灣前途應由全體住民共同決定」。
1987.11.10	民進黨	民進黨第二屆全國代表大會發表聲明，強調「人民有主張臺灣獨立的自由」。
1988.2.22	國民黨政府 李登輝總統	在繼任總統後首次召開記者會，李登輝表示將在蔣經國的「三不政策」之下，以務實的態度推展「彈性外交」。李並強調調臺灣獨立並非合法的行動，也會危及臺灣的穩定。
1988.4.17	民進黨	民進黨二屆一大會通過「四一七決議文」，內容包括： 1. 臺灣國家主權獨立，不屬於北京為首都之中華民國。 2. 任何臺灣國際地位之變更，必需經臺灣全體住民自決同意。 3. 如果國共片面和談，如果國民黨出賣臺灣人民之利益，如果中共統一臺灣，如果國民黨不實施真正的民主憲政，則民進黨主張臺灣應該獨立。

1989.5.1	國民黨政府代表 郭婉容	財政部長郭婉容率團赴北京出席亞銀年會，此一行動間接承認「兩個中國」的存在。
1990.10.7	民進黨	民進黨四屆二大會通過「一〇〇七」決議文，強調：「我國事實主權不屬於中國大陸及外蒙古；我國未來憲政體制及內政、外交政策，應建立在事實領土範圍之上。」
1991.2.23	國民黨政府	國統會通過「國家統一綱領」，宣示「一個中國」是未來的、民主的、自由的，現在臺灣和大陸是對等政治實體，並分三階段來追求自由、民主、均富的新中國。
1991.4.30	國民黨政府 李登輝總統	李總統宣佈終止動亂時期，將中共從「叛亂組織」重新定位為「中共當局」、「大陸當局」，兩岸互為對等政治實體。
1991.10.13	民進黨	民進黨第五屆全國代表大會通過「台獨黨綱」，主張：「建立主權獨立自主的臺灣共和國，……基於國民主權原理，建立主權獨立自主的臺灣共和國及制定新憲法的主張，應交由臺灣全體住民以公民投票方式選擇決定。」
1992.8.1	國民黨政府	國統會正式界定「一個中國」涵意，並指出台海雙方所稱的「一個中國」涵意並不相同。其中臺灣的一個中國是一九二一年成立的中華民國，目前治權僅及於台、澎、金、馬，將來的中國應是自由、民主、均富的中國。而中共的一個中國是指中華人民共和國，臺灣被其統一後，為一個「特別行政區」。
1992.11.16	國民黨政府、中共當局	海基會和海協會在香港交換對「一個中國」的不同詮釋。事後國民黨將此一對話解釋為雙方同意「一個中國，各自表述」，但中共方面反對有此共識。
1993.4.27	國民黨政府、中共當局	海基會和海協會在新加坡召開辜汪會談，臺灣向國際宣告台海雙方已展開政治實體的對話。
1993.5.20	國民黨政府 李登輝總統	在就職三週年的記者會中，李總統提出「生命共同體」和「中華民國在臺灣」等觀念，並且強調爭取中華民國加入聯合國的重要性。
1993.9.	國民黨、民進黨	國民黨和民進黨共同組團赴美遊說各國支持臺灣（中華民國）。

日期	政黨	內容
1993.11	國民黨政府代表江丙坤	國)加入聯合國。 臺灣代表江丙坤在西雅圖亞太經合會中提出「以一個中國為指向的階段性兩個中國政策」，以回應中共提出的「一個中國」。
1994.4.14	國民黨政府李登輝總統	在接受《自由時報》專訪中，李登輝強調「主權在民」的觀念，並表示現階段是「中華民國在臺灣」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大陸」並存。
1994.4.30	國民黨政府李登輝總統	在接受日本作家司馬遼太郎的訪問中，李登輝提到「生為臺灣人的悲哀」，並強調「國民黨是外來政權」、「臺灣必須是臺灣人的」。
1994.4.23	國民黨政府李登輝主席	在國民黨年終工作檢討會上，李登輝表示：「在臺灣的兩千一百萬人民當中，有原住民族，也有先後數百年從大陸來台的同胞。在我們之間，不應該有任何族群分化論調。大家都是中國人，而且只要認同臺灣，為臺灣的生存發展奉獻心力，不論哪一個族群，不論來台先後，大家都是臺灣人。」
1995.1.14	國民黨政府李登輝總統	李登輝出版「經營大臺灣」一書，揭舉「經營大臺灣，建立新中原」的治國理念，強調臺灣地區多元文化匯集、累積、激盪出來的嶄新文化，能夠在整個中國文明總體的發展趨勢中，躍居為最先進的再生力量，成為中國文化的「新中原」。
1995.6	國民黨政府李登輝總統	李總統赴美國康乃爾大學演講，提出「中華民國在臺灣」，表示臺灣人民不能接受被孤立和矮化的國際地位。
1995.9.15	民進黨主席施明德	民進黨主席施明德在美國公開表示「民進黨如果執政，不必也不會宣佈臺灣獨立」。
1995.9.31	民進黨總統候選人彭明敏	民進黨總統候選人彭明敏表示「臺灣已經獨立數十年了，因此支持現狀就是支持台灣獨，只有統一才是要改變現狀」。
1996.3	國民黨政府李登輝總統	在總統大選後接受《亞洲華爾街日報》的訪問時，李登輝表示：「中華民國的主權及治權僅及於台、澎、金、馬，臺灣是主權獨立的國家。」
1997.11	國民黨政府李登輝	在接受《華盛頓郵報》和《泰晤士報》專訪時，李登輝表示：「臺灣早就獨立，是主權獨立國家」、「臺灣就是臺灣，並

日期	總統	內容
1997	民進黨新潮流系林濁水	非中華民國一省」。 「台灣獨綱」起草人林濁水對「獨立建國」提出修正解釋，強調「主權已經獨立，建國尚未成功」。
1998.10	國民黨政府	海基會董事長辜振甫赴上海、北京與中共高層官員對話，提出波茨坦宣言，強調1945年日本將臺灣移交中華民國政府，而當時中華人民共和國尚未成立。
1998.11	國民黨政府李登輝主席	在為國民黨台北市長候選人馬英九的助選演講中，李登輝提出了「新臺灣人」的論述。
1999.4.23	民進黨總統候選人陳水扁	陳水扁在美國公開表示：「臺灣是主權獨立國家，國號就叫中華民國」、「臺灣和中華民國是兩個互相獨立、互不所屬的華人國家，應發展特殊的國際關係；至於兩國未來是否會成為一個國家，應經全體臺灣人民共同決定」。
1999.5.8	民進黨	民進黨第八屆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臺灣前途決議文」，強調：「臺灣是一主權獨立國家，其主權領域僅及於台澎金馬與其附屬島嶼，以及符合國際法規定之領海與鄰接水域。臺灣，固然依其目前憲法稱為中華民國，但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任何有關獨立現狀的更動，都必須經由臺灣全體住民以公民投票的方式決定。」
1999.7.9	國民黨政府李登輝總統	在接受德國之聲訪問時，李登輝提出「兩國論」，表示：「1991年修憲以來，已將兩岸關係定位在國家與國家，至少是特殊的國與國的關係，而非一合法政府，一叛亂團體，或一中央政府，一地方政府的「一個中國」的內部關係。」
1999.8.29	國民黨	國民黨十五全二次大會將「特殊國與國關係」納入政治提示案，作成大陸政策指導方針。
2000.5.20	民進黨政府陳水扁總統	陳水扁在總統就職演說中宣示：「兩岸人民源自相同的血緣、文化和歷史背景」、「秉持民主對等原則，在既有基礎之上，以善意營造合作的條件，共同來處理未來『一個中國』的問題」、「只要中共無意對台動武，本人保證在任期之內，不會宣佈獨立、不會更改國號、不會推動兩國論入憲、不會推動改變現狀的統獨公投，也沒有廢除國統綱領與國統會的問題」。

2000.11	李登輝	李登輝在亞洲的智略一書中提到：「臺灣的認同問題已成熟到『臺灣中華民國』的階段。中華民國不再是原來的中國民國，而是『新的共和』(New Public)，也就是『第二共和』。」
2000.12.31	民進黨政府陳水扁總統	陳水扁在「跨世紀談話」中表示：「依據中華民國憲法，『一個中國』原本並不是問題」、「從兩岸經貿與文化統合開始著手，逐步建立兩岸間的信任，進而共同尋求兩岸永久和平、政治統合的新架構」。

在1996年當選中華民國第一任直選總統之後，李登輝更數次對外表示：「臺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她的國號叫中華民國」或是「中華民國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她的領土範圍在台澎金馬」(林佳龍1999)。在1998年底接受讀賣新聞訪問時，李登輝進一步闡釋：「『中華民國』是主權獨立的國家，因為擁有主權，所以沒有必要再行『臺灣獨立』、更改國號了」(《中國時報》1998年12月19日)。從以上描述中，我們可以看到李登輝對國家定位論述的轉變，其軌跡大體上是從「一個中國」到「一國兩府」，到「兩個中國」，再到「中華民國 = 臺灣」。基本上，除了國號保留為中華民國之外，在李登輝的論述中，臺灣已經是一個完全獨立和自主的國家，而對這個獨立現況的改變，也必須要經過民主的程序。換句話說，和中國大陸的統一既不是現存的事實，也不一定是臺灣未來唯一的選擇。誠如李登輝在1998年底於國民大會談話時強調：「我們是主權獨立國家」，「並不是光提大中華民族這麼一句話，兩岸就可以統一」，「統一必須有法律基礎」(《中國時報》1998年12月10日)。

李登輝路線的完成最後反映在「兩國論」的提出。³²在1999年7月9日接受德國之聲訪問時，李登輝更清楚地闡明他的立場：

³² 根據事件後各種全國性民意調查，大約有五至七成民眾表示支持「兩國論」，而持反對意見的大約是一至二成左右。

歷史的事實是，1949年中共成立以後，從未統治過中華民國所轄的台、澎、金、馬。我國並在1991年的修憲，增修條文第十條(現在為第十一條)將憲法的地域效力限縮在臺灣，並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大陸統治權的合法性；增修條文第一、四條明定立法院與國民大會民意機關成員僅從臺灣人民中選出，1992年的憲政更進一步於增修條文第二條規定總統、副總統由臺灣人民直接選舉，使所建構出來的國家機關只代表臺灣人民，國家權力統治的正當性也只來自臺灣人民的授權，與中國大陸人民完全無關。1991年修憲以來，已將兩岸關係定位在國家與國家，至少是特殊的國與國的關係，而非一合政府，一叛亂團體，或一中央政府，一地方政府的「一個中國」的內部關係。³³

基本上，我們可以用「中華民國第二共和」來形容李登輝所建立的國家體制。³⁴

除了以務實的態度重新詮釋臺灣的國家定位以便和民主的發展相容之外，李登輝還企圖調和省籍矛盾以及臺灣人認同和中國人認同的衝突，建構一個以公民權為基礎的國族認同。在1994年底國民黨中央黨部年終工作檢討會上，李登輝發表了以下談話：(新聞局編1995: 49-50)

在臺灣的兩千一百萬人當中，有原住民，也有先後數百年先後從大陸來台的同胞。在我們之間，不應該有任何族群分化論調。大家都是中國人，而且只要認同臺灣，為臺灣的生存發展奉獻心力，不論哪一個族群，不論來台先後，大家也都是臺灣人。

³³ 引自總統府新聞稿 (<http://www.oop.gov.tw/619>)。

³⁴ 在作者於1998年10月19日訪問李登輝時，他即提到「中華民國第二共和」的概念。

在臺灣民主化完成之後，李登輝於1998年底進一步闡釋他所謂的「新臺灣人」和「新臺灣主義」：（《中國時報》1998年12月19日）

臺灣原本是化外之地，是遭拋棄的場所，而成為日本殖民地。其後臺灣以自己的方式發展至今，戰後，國民黨來到臺灣，臺灣人長久以來未擁有自己的政權，對於自己的臺灣，自己卻無可奈何，這是過去我所說的「生為臺灣人的悲哀」。現在我們已經在創造我們自己的臺灣，因此不要再提本省人與外省人之間省籍矛盾的話，而在此團結，這是新臺灣主義，包括原住民，均來當臺灣人、新臺灣人。

從以上的引述中，我們可以知道李登輝所企圖建構的臺灣人認同基本上是以居住在臺灣各族群為主體的一種身份認同。在稍後接受日本諸君月刊訪問時，李登輝再用美國的經驗來對照說明他所期待的臺灣人認同的性質：（《中央日報》1999年2月2日）

回溯更前面的歷史，就是因為臺灣受過清朝、西班牙、荷蘭、日本等為政者更迭的長久經驗，現在的臺灣人才變得更強烈要求「自由」與「民主」。這是臺灣和美國非常相似的一點。雖說是美國人，但都是從英國、德國、匈牙利、俄羅斯及亞洲各個不同的國家、地區來的移民。他們追求「自由」與「民主」來到新大陸，那成為他們自認為美國人的依據，而非認同祖國或民族。這在臺灣也是如此。臺灣有泰雅、阿美、雅美等九個原住民族，大陸也有人為追求「自由」而來，他們的後裔就是我們臺灣人。我的祖先在四百年前為逃避明朝的暴政而來到臺灣，現在被稱為「外省人」的人們也是五十年前逃避共產黨而來。逃到臺灣的人，不是要作統治者君臨天下，而是要建設新的國家，吾人應該尊重這樣的精神。在建設我們的政治、我們的社會時，一定要在「自由」與「民主」中尋求基本精神。無論我的根源是「客家」、「外省人」或

「臺灣人」，如果在政治上作這樣的區別的話，一定會陷入自我定位的危機。

在接受作者的訪問中，李登輝更直接的指出：「臺灣人雖然具有中國文化 and 血統的背景，但政治上我們是臺灣人，不是中國人」、「中華民國已經是一個獨立的國家，解決兩岸問題必須秉持民主和對等的原則，而非抽象的民族主義」。³⁵ 總結以上發現，李登輝明顯地是企圖以公民民族主義的論述來調合國族認同和國家定位的矛盾。而值得注意的是，李登輝的論述進一步牽動了民進黨和新黨的論述調整。

二、民進黨的民族主義論述

面對國民黨的「中華民國在臺灣」以及「新臺灣人」等務實論述，民進黨和新黨為了避免被邊緣化，也不得不加速修正既有的論述（參見表八）。在民進黨方面，鑑於「中華民國」已經民主化和臺灣化，前主席施明德在1995年9月（該年立委選舉前）首次公開表示：「臺灣已經獨立了將近半個世紀，民進黨如果執政，不必也不會宣佈臺灣獨立」（《中國時報》1995年9月15日）。兩個禮拜之後，民進黨總統候選人彭明敏進一步強調：「臺灣已經獨立數十年了，因此支持現狀就是支持台灣，只有統一才是要改變現狀」（《世界日報》1995年10月1日）。在1997年底贏得縣市長選舉後，當時的民進黨主席許信良表示「『台灣黨綱』³⁶是一個陳述民進黨理想的歷史文件，並不是一個要立即實施的政策」（《中國時報》1997年12月12

³⁵ 作者訪問李登輝手稿，1998年10月19日。

³⁶ 民進黨在1991年10月第五屆全國代表大會上通過俗稱「台灣黨綱」的以下條文：「建立主權獨立自主的臺灣共和國……」。基於國民民主權原理，建立主權獨立自主的臺灣共和國及制定新憲法的主張，應交由臺灣全體住民以公民投票方式選擇決定」。事實上，就以上的陳述而言，似乎稱為「公投黨綱」較為適合。

日)。在 1999 年 1 月，民進黨秘書長暨新潮流系領袖邱義仁也表示：「雖然建立一個主權獨立的臺灣共和國仍是民進黨的目標，但並不表示我們將擇手段來實現這個目標；我們必須回應選民的擔憂，並使他們相信民進黨將不會無視現實採取任何莽撞的行為」。³⁷

1998 年底，民進黨在立委和臺北市長選舉中遭遇挫敗。這個挫敗促使民進黨領導菁英考慮進一步以「承認」中華民國的方式來重新論述臺灣的國家定位。換句話說，即一方面接受「兩個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 vs. 中華民國）為一事實，但同時也將中華民國「臺灣化」，強調臺灣已經是一個獨立的國家，她的國號叫中華民國。此一論述轉變後呈現在民進黨代表大會於 1999 年 5 月 8 日通過的「臺灣前途決議文」。該決議文強調：

臺灣是一主權獨立國家，其主權領域僅及於台灣島與其附屬島嶼，以及符合國際法規定之領海與鄰接水域。臺灣，固然依其目前憲法稱為中華民國，但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任何有關獨立現狀的更動，都必須經由臺灣全體住民以公民投票的方式決定。……在 1999 年的今天，體制改造雖然未竟全功，但朝野在國家認同上水火冰炭的尖銳衝突漸趨緩和，開啟了一致對外的新契機。如今，在面對中國的壓力時，朝野的差異已從國家認同的價值層面，縮小至確保國家安全與主權獨立的政策層面。³⁸

民進黨 2000 年總統選舉的候選人陳水扁在臺北市長競選連任落選後即曾表示：「願意站在同為華人的歷史文化基礎上，思考兩個華人國家（即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可能產生的特殊關係」（《中國時報》1998 年 12 月 26 日）。在 1999 年 4 月訪美期間，陳水扁進一步闡釋他對國族認同和

國家定位的看法：（《中國時報》1999 年 4 月 28 日）

臺灣在三十年前經由全民選出自己的總統後，不但主權已經獨立，也為「中華民國」賦予新的意義。……臺灣主權既已獨立，國號並不是不能更改，但若要求更改國號，其前提是仍須經全體人民同意，這不是任何一黨或一人的權利。……臺灣和中國更是兩個主權各自獨立、互不相屬的華人國家，未來應致力發展出「特殊的國際關係」。

陳水扁在當選第十屆中華民國總統之後，為了爭取多數人民的認同，更進一步提出了所謂「四不一沒有」以及「政治統合論」的觀點，同時也一再指出「兩岸人民源自相同的血緣、文化和歷史背景」，並呼籲「兩岸政府與人民多多交流，秉持『善意和解、積極合作、永久和平』的原則，尊重人民自由意志的選擇」。

從陳水扁的談話可以清楚看出，他的論述和李登輝的論述已經相差無幾。基本上，雙方皆認為臺灣人具有華人的文化背景，但在政治上並不是中國人；臺灣已經是一個獨立的國家，她的國號叫中華民國；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兩個互不統屬的國家；對於臺灣國家地位或符號的改變，無論是兩岸統一或更改國號，都必須經過臺灣人民以民主的程序來決定。

三、新黨等統派的民族主義論述

國民黨和民進黨在民族主義論述上的匯合對主張統一的新黨產生很大的壓力。在 1995 年立委選舉之後，鑑於國民黨在立法院只能維持勉強過半的席次，新黨和民進黨開啓了所謂的「大和解」，彼此決定淡化族群動員，轉而尋求在一般公共政策議題上合作。在 1996 年總統選舉之後，進一步意識到多數選民傾向兩岸維持現狀，部份新黨領導者開始提出「一中兩國」的口號，希望以「一個中國，兩個華人國家」的論述來重新界定兩岸關係。

在 1998 年臺北市長選舉期間，李登輝提出「新臺灣人」概念，並獲得

³⁷ 引自 Taiwan Security Research 電子網站(www.taiwanssecurity.org)，1999 年 1 月 3 日。

³⁸ 引自民主進步黨第八屆第二次全國黨員代表大會會議資料，1999 年 5 月 8 日。

了跨黨派選民的支持，其中也包括許多中國認同者和統一支持者。根據一項選後的民意調查，分別有 72% 的國民黨支持者、55% 的民進黨支持者和 55% 的新黨支持者表示認同新臺灣人的概念。相較而言，年輕的、受高等教育的和中產階級的選民尤其能夠接受新臺灣人的認同。此外，在認同自己是新臺灣人的受訪者中，有 78% 認為「『中華民國在臺灣』事實上是一個獨立的國家」，72% 同意「臺灣和大陸是兩個獨立的國家」。³⁹ 面對此一發展趨勢，不少新黨領導者希望重新提出能為多數人接受的國族認同和國家定位的論述。但是到目前為止，新黨的轉型並不順利。1998 年的立委選舉結果是個重要的轉折。原因是新黨在 225 位立委中只當選 11 席，而更關鍵的是，當選者多為較強硬的中國民族主義者，而大多數主張調整論述的溫和派反而落選。

這個結果對新黨的轉型無疑是個挑戰，因為對大多數臺灣人民來說（包括相當部份具有中國人認同和支持中國統一者），如果宣稱自己是中國人或支持兩岸統一換來的將是中共式的民族主義，自然不願意擁抱「一個中國」的原則，而寧可接受「文化中國、政治臺灣」的論述。受到以上結構性的限制，也難怪即使是統派的精神領袖郝柏村也要表示：（《世界日報》1998 年 1 月 12 日。）

兩岸關係的發展基本上有兩條路可以走。一條是從維持現狀走向統一，即民主先於統一，另一條路是接受中共的一國兩制，即統一先於民主。我個人傾向走第一條路。……我們絕不能接受中共政權的一個中國原則，因為這無異於向中共投降。

中共式的民族主義在臺灣之所以缺乏市場，和臺灣近年來的民主化有很大的關係。我們可以從以下故事體會到兩岸之間所存在的巨大制度鴻溝。

³⁹ 此調查為《聯合報》於 1998 年 12 月 28-31 日針對臺灣地區進行的電話訪問，樣本數 1335，正負誤差在 3% 以內。

1998 年 9 月，臺灣一個主張統一的團體「合統會」在北京和中共的「全國臺灣研究會」及「社科院臺灣研究所」的學者舉行座談。在座談中，中共學者極力推銷「一國兩制」，但卻引來了新黨學者周玉山的質疑。周表示，三年前他弟弟周陽山（新黨背景）參加立委選舉，高舉捍衛中華民國得到五萬多票；另一位候選人支持「一國兩制」卻只得到八百多票；因此，他無法接受「一國兩制」，除非將來兩岸統一各自放棄現有國號，另定國名才有可能。為了強調他的觀點，周進一步表示，他是強烈的李登輝批評者，但他住在臺灣，每天一覺醒來，常可在報章雜誌上看到自己批評李登輝的文章出現，對於這種精神生活的自由度，他稱之是愉快經驗。但他不敢想像，如果統一實施一國兩制，他一覺醒來是否可看到批評江澤民的文章與輿論（《中國時報》1998 年 9 月 16 日）。

總結以上分析，無論是在一般大眾或政治菁英之間，臺灣人民基本上都已經對國家認同和國家定位形成了務實的共識。在多數人的認知中，「中國人」比較是一種文化的概念，而「臺灣人」則主要是一種政治身份的認同。在國家定位方面，大多數人也已擺脫名詞的糾葛和情緒性的批評，承認臺灣中華民國在現實上已經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並且願意以民主的程序來解決對國家前途的爭議。基本上，除了一小部份中國民族主義勢力之外，一般臺灣人民對於和中國大陸共同建立一個民族國家的願望和期待已經相當稀薄。在相當程度，中國統一在臺灣已經不再是一種政治上的民族主義運動，而比較是一種對中國文化的眷戀。換句話說，很多人可以接受自己是中國人，但並不願致力於建立一個中國人的國家。相反的，臺灣人認同則具有高度的政治意涵，指涉某種共同的公民身份。以上臺灣人民國家認同的轉變和晚近臺灣的政治發展有密切的關係。作者先前已經指出，臺灣的民主化和兩岸關係的發展是形塑臺灣公民民族主義的兩大政治力量。如果以上的趨勢繼續發展下去，似乎沒有理由對公民民族主義在臺灣的進一步深化感到悲觀。我們甚至可以樂觀的期待，公民民族主義的深化不但有利於臺灣的民主鞏固，也會有助於建構穩定健康的兩岸關係。

參考文獻

- 王甫昌, 1996, 〈臺灣反對運動的共識動員〉, 《臺灣政治學刊》, 1, 頁 129-209。
- 江宜樺, 1998, 《自由主義、民族主義與國家認同》。臺北: 揚智文化出版社。
- 吳乃德, 1996, 〈自由主義與族群認同: 搜尋臺灣民族主義的意識型態基礎〉, 《臺灣政治學刊》, 1, 頁 5-39。
- 吳叡人, 1997, 〈民主化的吊詭與兩難? 對於臺灣民族主義的再思考〉, 載: 游盈隆編, 《民主鞏固或崩潰: 臺灣 21 世紀的挑戰》。臺北: 月旦出版社, 頁 31-48。
- 林佳龍, 1999, 〈解釋臺灣的民主化: 政體類型與菁英的策略選擇〉, 載: 林佳龍、邱澤奇編, 《兩岸黨國體制與民主發展》。臺北: 月旦出版社, 頁 87-152。
- 林佳龍, 1989, 〈威權侍從政治下的臺灣反對運動: 民進黨社會基礎的政治解釋〉, 《臺灣社會研究季刊》, 2 (1), 頁 117-43。
- 林佳龍, 1998, 〈臺灣的黨基選舉、政黨重組與民主鞏固: 一個制度論的觀點〉, 臺灣政治學會第五屆年會研討會發表論文。臺北, 東吳大學, 12 月 12-3 日。
- 張茂桂, 1997, 〈談身份認同政治的幾個問題〉, 載: 游盈隆編, 《民主鞏固或崩潰: 臺灣 21 世紀的挑戰》。臺北: 月旦出版社, 頁 91-116。
- 張茂桂等, 1993, 《族群關係與國家認同》。臺北縣: 業強出版社。
- 新聞局編, 1995, 《奉獻與奮鬥: 李登輝總統言論選集》。臺北: 行政院新聞局。
- Anderson, Benedict. 1991.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 Balakrishnan, Gopal and Benedict Anderson, eds. 1996. *Mapping the Na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 Brubaker, Rogers. 1992. *Citizenship and Nationhood in France and German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Brubaker, Rogers. 1996. *Nationalism Reframed: Nationhood and the National Question in the New Europ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Cheng, Tun-jen and Yung-ming Hsu. 1996. "Issue Structure, the DPP's Factionalism and Party Realignment" in Hung-mao Tien, ed., *Taiwan's Electoral Politics and Democratic Transition: Riding the Third Wave*. Armonk, NY: M.E. Sharpe, pp. 137-73.
- Chu, Yun-han and Tse-min Lin. 1996. "The Process of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in Taiwan: Social Cleavage, Electoral Competition, and the Emerging Party System," in Hung-mao Tien, ed., *Taiwan's Electoral Politics and Democratic Transition: Riding the Third Wave*. Armonk, New York: M.E. Sharpe, pp. 79-104.
- Conner Walker. 1994. *Ethnonationalism: The Question for Understanding*.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Dahl, Robert A. 1986. *Democracy, Liberty, and Equality*.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Dahl, Robert A. 1989. *Democracy and Its Critic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Diamond, Larry and Marc F. Plattner, eds. 1994. *Nationalism, Ethnic conflict, and Democracy*.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Gellner, Ernest. 1983.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Greenfield, Liah. 1992. *Nationalism: Five Roads to Modernit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Haas, Ernst. 1997. *Nationalism, Liberalism and Progres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Hobsbawm, E. J. 1990.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Since 1780: Programme, Myth, Real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utchinson, John and Anthony Smith, eds. 1994. *National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Keating, Michael. 1996. *Nations against the State: The New Politics of Nationalism in Quebec, Catalonia and Scotland*.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 Kupchan, Charles A., ed. 1995. *Nationalism and Nationalities in the New Europ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Lijphart, Arend. 1977. *Democracy in Plural Societies: A Comparative Explorat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Lin, Tse-mau, Yun-han Chu, Tong-yi Huang and Baohui Zhang. 1996a. "Elections and Elite Convergence: The Consolidation of Democracy in Taiwan," paper presented at the 92nd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August 29-September 1, San Francisco, California.
- Lin, Chia-lung. 1996. "Nationalisms and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in Divided Societie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second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North America Taiwan Study Conference, May 24-6,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 Lin, Chia-lung. 1998. *Paths to Democracy: Taiwan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Ph. D dissertation submitted to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Yale Universit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forthcoming)
- Lin, Tse-min, Yun-han Chu, and Melvin J. Hinich. 1996. "Conflict Displacement and Regime Transition in Taiwan: A Spatial Analysis" *World Politics* 48 (July): 453-81.
- Linz, Juan J. 1985. "From Primordialism to Nationalism," in Edward A. Tiryakian and Ronald Rogowski, eds. *New Nationalisms of the Developed West*. Boston: Allen & Unwin. pp. 203-53.
- Linz, Juan J. 1993. "State Building and Nation Building," *European Review* 1 (4): 355-69.
- Linz, Juan J. and Alfred Stepan. 1996. *Problems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 and Consolidation: Southern Europe, South America and Post-Communist Europe*.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Lipset, Seymour M. [1960] 1983. *Political Man: The Social Bases of Politics*. Expanded and updated edition. London: Heinemann.
- McKim, Robert and Jeff McMahan, eds. 1997. *The Morality of National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Miller, David. 1995. *On Nationalit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Riker, William H. 1982. *Liberalism against Populism: A Confrontation between the Theory of Democracy and the Theory of Social Choice*. Prospect Heights, Illinois: Waveland Press.
- Rustow, Dankwart A. 1970. "Transitions to Democracy: A Dynamic Model," *Comparative Politics* 2 (3): 337-63.
- Sartori, Giovanni. 1987. *The Theory of Democracy Revisited*. Chatham (NJ): Chatham House.
- Smith, Anthony D. 1991. *National Identity*. Reno: University of Nevada Press.
- Tamir, Yael. 1993. *Liberal Nationalis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Truman, David B. 1951. *The Governmental Process*. New York: Knopf.

民族主義與兩岸關係 林佳龍、鄭永年主編
臺灣研究基金會叢書二之六，頁 267-302
2001 年 4 月，臺灣，臺北：新自然主義公司出版

Wachman, Alan M. 1994. *Taiwan: National Identity and Democratization*.

Armonk (NY): M.E. Sharpe.

Walzer, Michael. 1992. *What It Means To Be an American*. New York: Marsilio.

臺灣為何要「自找麻煩」？

～全球化趨勢與臺灣的國格需求

汪宏倫

臺灣大學社會學系 助理教授

壹、導論：從「兩國論」和“Troublemaker”談起

1999 年 7 月間，李登輝總統在接受德國媒體訪問時，提出海峽兩岸的關係應該被定位成「特殊的國與國關係」。這段後來被稱為「兩國論」的談話一出，立即在國內外引起軒然大波。除了臺灣內部的爭議與討論外，北京方面也一如往例，撻伐之聲隨即四起，而華盛頓方面也皺起了眉頭，認為李登輝又一次不按牌理出牌，給兩岸關係帶來新的變數。於是，一時之間，一個奇怪的等號：李登輝＝臺灣＝麻煩製造者(troublemaker)，再度被劃上。¹

¹ 參見《中國時報》，1999 年 7 月 15 日。此處明顯牽涉到一個十分麻煩的「異文混同」(conflation)的問題，也就是日常用語中把「國家/政府」(state/government)與其所代表的「政治社群」(political community)等同起來，而值得注意的，筆者在短短的一句話當中，又分別刻意使用常見的「首都」與「領導者」來代表「國家/政府」。這種異文混同的情形，在日常用語與時事報導中屢見不鮮，令人習焉不察；然而，在從事比較嚴謹的學術分析時，這種異文混同往往造成極大的困擾，因為我們常常無法確定施為者(agents)或研究對象究竟何所指，同時也牽涉到何者才具有「可歸因性」(accountability)的問題。尤其在民族主義的討論中，這個問題更反映在「國家」與「民族」(國族)的混同(the conflation of state and nation)。這個混同，不但出現在日常用語中，也出現在中西文的學術討論裡，使得對於與此相關的種種論辯，更加複雜難解（有關西文中對此問題的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民族主義與兩岸關係：哈佛大學東西方學者的對話／

林佳龍、鄭永年主編／林佳龍等著．

初版．--臺北市：新自然主義，2001〔民90〕

面：公分．--（月旦政治研究系列；7）

（臺灣研究基金會叢書；2：6）

ISBN 957-696-430-X（平裝）

1. 兩岸關係—論文，講詞等．

573.09

90005234

民族主義與兩岸關係

主編：林佳龍、鄭永年

作者：江宜樺、吳所怡、吳觀人、李廣均、汪宏倫、林佳龍、張茂桂、

許宗力、王飛凌、吳國光、周建明、陳其、鄭永年

發行人：洪美華

出版者：新自然主義股份有限公司（原月旦出版公司）

網址：www.thirdnature.com.tw

E-mail：moon@ml8.hinet.net

地址：台北市建國南路二段9號10樓之2

電話：(02)27845369 傳真：(02)27845358

電腦排版：陳明通

印製：久裕印刷有限公司

初版：2001年4月

郵撥帳號：17239354 新自然主義股份有限公司

定價：新台幣450元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倒裝，請寄回更換

ISBN 957-696-430-X

總經銷：農學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縣新店市寶橋路235巷6弄6號2樓

電話：(02)29178022 傳真：(02)29156275

新自然主義 讀者回函卡

謝謝您購買本書，為加強對讀者的服務並使往後的出書更臻完善，請您詳填本卡各欄，投入郵筒寄回（免貼郵票），我們將隨時為您提供最新的出版訊息，以及活動相關資料。

書籍名稱：_____	_____
購買本書的方式：	_____
☐ 01 在_____市（縣）_____書局購買	☐ 02 創撥 ☐ 03 贈送
☐ 04 展覽、演講活動，名稱_____	☐ 05 其他_____
您從何處得知本書消息？	
☐ 01 逛書店 ☐ 02 報紙廣告 ☐ 03 報紙、雜誌介紹 ☐ 04 親友推薦	_____
☐ 05 書訊 ☐ 06 廣播節目 ☐ 07 其他_____	_____
您對我們的建議：_____	

您的個人資料：姓名_____電子信箱：_____	
性別： ☐ 男 ☐ 女	出生日期：_____年_____月_____日
電話：（_____）_____	傳真：（_____）_____
地址：□□□□_____縣（市）_____鄉鎮區（市）_____路_____街_____段_____巷_____弄_____號_____樓	_____
教育程度： ☐ 01 小學 ☐ 02 國中 ☐ 03 高中（職） ☐ 04 大專	
☐ 05 研究所 ☐ 06 其他_____	
職業： ☐ 01 學生 ☐ 02 教育 ☐ 03 軍警 ☐ 04 其他公務 ☐ 05 金融業	
☐ 06 出版傳播 ☐ 07 醫藥 ☐ 08 資訊科技 ☐ 09 法律工作 ☐ 10 其他自由業	
☐ 11 其他服務業 ☐ 12 製造業 ☐ 13 家管 ☐ 14 其他_____	